

毛泽东

政治思想

延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A84
64

88345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F68/16

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

主编 高智瑜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

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

主编 高智瑜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照排室排版

陕西师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8 插页 204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154-4/G·4438

定价:11.20 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DF68/16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

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宏伟开篇.....	(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 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最高体现	(10)
——人民战争战略思想	
三 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首要出发点	(16)
——人民政权建设	
四 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根本保证	(21)
——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	
第二章 制定抗日战争正确的政治路线	(29)
一 大变动前夜的国情认识和阶级分析	(30)
二 政治决策的科学思想方法	(40)
三 新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	(52)
第三章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坚持独立自主方针	(66)
一 不可避免的斗争	(66)
二 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	(75)
三 反对两种投降主义	(86)
第四章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新发展	(104)
一 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理论建设.....	(104)

二	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124)
三	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造性贡献·····	(148)
第五章	自觉实现由民族战争胜利到	
	民主革命胜利的转变·····	(166)
一	迎接民族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思想准备·····	(166)
二	崭新的建国方略·····	(175)
三	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指导思想·····	(187)
第六章	人民的最后胜利·····	(203)
一	科学的形势分析，正确的革命决策·····	(203)
二	坚强的革命胆识，灵活的斗争策略·····	(212)
三	战胜一切反动派的科学论断·····	(223)
四	彻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战略决策·····	(233)
五	第二条战线的辉煌·····	(247)
六	夺取最后胜利的行动纲领·····	(260)

第一章 绪 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座英雄城池延安，像红星闪耀在中国大西北黄土地上。延安的英名，与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建树紧密相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28 年民主革命艰苦岁月，将近一半时间是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度过的。在这里，党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形成了以革命领袖为核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并哺育了一大批革命中坚力量，最终成为创建新中国的栋梁。在这里，绘制出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这里，树立起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而最可宝贵的，是在这里诞生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延安 13 年，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有成效的时期。延安，也因此成为革命圣地而享誉世界，名垂青史。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绩。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决定全局和历史命运的政治路线，政治决策及战略策略思想。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它在一切社会变革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并昭示着历史发展的趋向。列宁曾经指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表现为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的政治，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为达此目的而制定的路线政策、战略策略，就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前列。党的一切政治决策、战略决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一革命目的服务的。这些政治决策、战略策略，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刻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进或后退，发展或停滞，无不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正确与否息息相关。一部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史，同时也是党为实现本阶级根本利益，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政治变革史。这种政治变革从党一成立就开始了。不过那时的党正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政治经验不丰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使党的根本政治变革的目标与近期革命目标相结合，因而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好指导革命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问题，即正确的政治决策问题。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沉痛教训之后，以遵义会议为契机，终于实现了在全党范围内正确政治决策代替错误政治决策的伟大转变。延安时期，正是党的正确政治思想及其决策达到高度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制定及其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在革命紧急

关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肩负起了历史的重托。从此，革命就在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及其决策思想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延安 13 年煌煌业绩，无不闪耀着毛泽东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光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和完善了自己原有的正确思想，从而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首次做出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归根到底，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而要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必须有人民政权来保证，由此更加深了对夺取政权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历史早已证明，革命人民是无法赤手空拳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得政权的。毛泽东据此进一步发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指导两次战争中建立了人民战争思想体系，成为战胜强大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只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战斗，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于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议事日程上。13 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在这些历史阶段中，给予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以重大影响的决策主要有：关于在新时期阶级分析基础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关于指导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民主革命战争的走向胜利；关于革命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解决；关于夺取政权的根本政治保证——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卓著成效。这就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并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值得永久继承和珍惜的宝贵财富。

一、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宏伟开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陕北会师到抗日战争爆发，是党自觉地积极地迎接抗战的战略准备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的核心，在于集中力量解决全面抗战的首要问题。这就是，党应该依靠谁，团结谁，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对抗战的政治领导。党一进入陕北，就于1935年底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当前国内外的形势、阶级间的变化和党的政策，做了完整的分析和正确的决定。其后，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讲话，奠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政治决策和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是一篇紧紧围绕抗日问题而进行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关系的估量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新的阶级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坚决反抗，还是妥协投降，或者游离于二者之间，这是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对此，国内存在着几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切亲日派、汉奸卖国贼为虎作伥，积极准备投降日本；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把枪口继续对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心愿坚决主张抗日，并树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这一基本特点指出，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正在

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全国各阶级和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政治态度。除了工人农民是抗日最坚决的力量外，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过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给他们带来过重大损害，使他们处于困顿的境地。如今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别无出路。曾经参加过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后来站到人民敌人那一方面去，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其政治态度是有发生变化的可能的，变化的总特点是动摇。他们中的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的可能。只有那些组成卖国贼营垒的大土豪、大劣绅、大官僚、大买办们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使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情况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他们依附于美、英、日等不同的帝国主义，因此相互之间的暗斗以至明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在科学分析当时中国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对抗日的态度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①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提供了客观阶级依据。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另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中国处于新的大革命的前夜，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革命的力量正在增长。党和红军得到了坚强的锻炼，若干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始恢复、生长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群众运动逐步走向高潮。这一切表明，革命的阵势正在由局部向全局发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观条件业已成熟。党的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

务就是要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为了实现党的政治战略，毛泽东提醒全党必须充分认识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就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缺点，必须准备作持久抗战。严酷的时局，要求我们党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以肩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毫无疑问，遵义会议的召开，万里长征的胜利，以及果断地将革命指挥中心转向陕北，都显示了党的日趋成熟和决策的正确。但是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克服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者在抗日问题上反对统一战线，坚持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左”的分析，否认在日本侵略面前，民族资产阶级有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共同抗日的可能，否认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发生分化的可能。因此，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必须走笔直的路，革命的力量必须绝对的纯粹，共产党人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关门主义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依了关门主义，其结果只能把千军万马赶到敌人方面去，博得敌人的喝采，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低落，甚至走向失败。毛泽东批评说：“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①而“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垮。”^① 因此，必须坚决摒弃贻误民族贻误革命的关门主义，而代之以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正确处理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所十分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统一战线得以实现的关键。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给蒋介石国民党以影响。为此，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有必要适当地调整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重新审视并决定自己的政策，特别是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② 新的形势要求党采取新的战略策略，其中包括在国内实现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在国际上同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进行合作谈判等。这一切又都与正确处理同蒋介石的关系直接相关联。毛泽东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依据对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结合，从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民族利益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确定了正确的政策，终于创造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形式，实现了以共同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政治基础。

党对待蒋介石的政策，经历了几个调整变化阶段。“九·一八”事变以后的4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抗日运动，实行“先剿匪，后抗日”的卖国政策，毛泽东称这时的蒋介石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并对其真面目进行了揭露。针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党鲜明地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也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

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新高潮的开始。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坚持“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原则立场，充分估计到在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有改变对日态度的可能，从而做出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决策。由于党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正确政策，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党的对蒋政策也就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其后，在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①的推动下，国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毛泽东认为，三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被迫由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政策即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上述正确政治决策，使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基本实现，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组成准备了第一个必要的条件。

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革命新时期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阶段，即争取民主的阶段。毛泽东适时地告诫说：“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

^① 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内容，详见第二章。

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① 争取民主，当然是向蒋介石国民党争取。为此，毛泽东要求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救亡抗战，反对蒋介石所谓的“长期准备”，反对一切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为了积极准备抗战，他还提出了实行国内民主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即将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动员人民进入抗战。毛泽东的以争取民主来巩固和平，实现人民总动员的思想和正确决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了第二个必要条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号召抗战的宣言，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十天之后，蒋介石发表谈话，终于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指出这是“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② 表明蒋介石在事实上接受了我党坚持抗战的政治决策。蒋介石公开发布了我党早已拟就的国共合作宣言，并发表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宣告成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两年多的时间仅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在中国大地上却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性变化。其间虽几经曲折，斗争从未止息，但在毛泽东正确政治决策指引下，党始终抓住“抗日”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不放，用行动向全国人民证明自己是坚决抗日的中坚力量，赢得了全国各党各派各阶级的信任，从而自觉地承担起抗日民族战争的政治领导责任和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

二、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最高体现 ——人民战争战略思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正式形成，就由军事合作迈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第一步。由于军事力量上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的抗战最初只能处于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政治决策的中心一环，是如何形成人民战争的强大气势，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举行一个坚实的奠基礼。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臻于完善。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革命人民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

人民战争，具有鲜明的正义性。它对外反对民族压迫，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对内反对阶级压迫，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离开战争的正义性，绝无人民性可言。人民战争，具有崇高的目的。它不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服务，而要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唯一宗旨。人民战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能

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总动员，去万众一心地共同进行对敌的战争。

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阶级不同，战争对于人民群众的依靠和发动，其广度和深度就必然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只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阶级及其政党，才能真正实现战争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党十分重视并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重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党所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从根本上说，都是在中国条件下进行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是我们党提出并坚持人民战争的最自觉的代表。“民众大联合”的提出，就奠定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基础。大革命时期，他率先喊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口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的中国式武装斗争道路，也是一条通过人民战争夺取胜利的道路。遵义会议以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以及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的转变，党对军事问题重要性的彻底认识，有效地指导了抗日战争并在抗战中得到新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发表了大量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论著，主要的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论解放区战场》等。这些论著所阐明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武器。在此基础上于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都

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些基本点是：

第一，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发展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①

第二，必须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坚强核心。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体的抗日人民军队，其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军队建立之始，党和毛泽东就规定了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总目标和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由此就产生了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军队的显著标志，即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

我们军队是民族的。它始终坚持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正因为如此，在日寇大举入侵面前，党和人民军队毅然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挥师北上，开赴抗日前线，深入敌人后方，以弱势兵力开展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正因为如此，党和人民军队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号召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政治派别团结一致，实行全民族抗战，誓与国土共存亡。为了民族大义，党捐弃前嫌，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有效地推动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它来自人民，和人民一体，始终为着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7页。

军队就具有其他一切军队所无法企及的“人和”的极大优势。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担负着反侵略战争主要任务的人民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在觉醒了的、组织起来的民众的支持下，我们的军队将不仅有源源不断的兵力和补充，而且有保证抗战胜利的财源补充。那么，我们的军队便是无敌于天下的。我们的军队是民主的。这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毛泽东告诫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军队的技术和战术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也是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力的。

第三，逐步形成足以发挥我军优势的一整套战略战术。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指导下，创造了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抗日战争所特有的内容和战法。其特点是：正规军、主力兵团处于机动作战的地位，担负打击敌人主力的任务，以保卫和发展根据地；游击队、地方兵团在较小的地域内坚持游击战，乘敌之隙，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民兵和非武装群众则是就地坚持，打破敌人的封锁分割和梳刮搜索，以保卫家乡，保卫群众利益。这种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是在同蒋介石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中得以贯彻的。应当看到，统一战线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是比较努力的，在国际上采取的许多措施也是值得赞许的。全国爱国军队包括国民党爱国将士，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负责的国民党战场，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部，成为抗日的主要战

场。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同其他战场的胜利一样，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全国抗日爱国运动得到发展。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他的抗日是被迫的，抗日的态度是动摇的，他总是力图把抗战限制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单纯抗战的范围内，把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一旦形势有变，又会回过头来加害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坚持一条片面抗战路线，用以同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相对立。斗争的焦点，在要不要人民抗战。这是关系到抗战能否胜利以及胜利果实属于谁的问题，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

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在战略防御阶段表现在人民抗战的问题上，由此展开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第一次斗争。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坚持过去10年中对待民众的政策，竭力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限制我党广泛地发动人民战争。并在汉奸卖国贼的从中穿插下，准备去上日本侵略者所谓和平的钓钩。结果，导致了祖国半壁河山陷于敌手。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片面抗战的错误，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不可能战胜日寇，“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①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坚决指出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的投降主义的危险，向人民群众讲明战争的胜利前途。他坚信，“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③党从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以敌后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作为坚持全面抗战的依托。正是由于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3页。

③ 同上。

牵制了大量的敌军，才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准备了重要条件。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集中表现为消极抗日，发动反共高潮。我党在以主要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依据毛泽东关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战略思想，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以斗争求得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战略反攻阶段，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表现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它的实质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力图攫取抗战胜利果实，重新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的老路上去。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我党在政治上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军事上坚持人民战争，这就为从民族战争的胜利到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党依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积极性，创造出弱小的革命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奇迹。党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抗战胜利不到一年，当蒋介石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党就以完全的自觉，纯熟地运用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在毛泽东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的科学论断的鼓舞下，在延安胜利地指挥并度过了解放战争最初的艰苦时日，以8个月的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以4个月的时间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终于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在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和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

三、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首要出发点 ——人民政权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着解决革命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这件第一要事，这成为他的政治决策的首要出发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思想，是在延安形成的，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理论和基本纲领，又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又做了重要补充，使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更臻完善。这样，到进北京前夕，即党的西柏坡会议，毛泽东已形成并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体系和政纲。

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于幼稚时期的党，理论上不成熟，只能依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办事；又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政权建设上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见，只是追随孙中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曾主张改造湖南联盟，此后也基本上是跟党中央持一致的观点，同意孙中山国民会议的政权思想，除此而外并未提出自己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理论。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则在于此时已经重视并支持“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村政权主张；大革命失败前夕，进一步提出“上山”的农村武装割据的谋略。应该说，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初萌芽。

十年内战期间，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围剿。国共两党斗争尖锐激烈，其他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形势出发，首先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找到的正确理论和道路。当然，这种在特定阶级分野条件下所制定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和纲领，它的政权构成不可能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而还不是完善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纲领。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纲领，终于在延安时期形成。这时的党，已经是全国规模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大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本人不仅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党的领袖，在创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体系上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其要点有：

（一）争取抗日民主，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政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民主的程度和形式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人民民主政权是对革命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抗战以前的国民党政权，是一党专制，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中国人民不但没有一般的民主，就连起码的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权利都没有。爱国有罪，抗日有罪，这就是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民主状况。

1936年以后，毛泽东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了多次讲话，着重阐明争取抗战民主问题。其主要内容是：必须给人民以抗日民主，不如此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结束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统治，实行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这就由抗战民主进而发展为建立抗战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这个政权“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① 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①在这里，毛泽东集中解决了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即必须由各革命阶级联合组成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权，而不是只由一个党所专有，只为少数人谋利的政权。

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毛泽东关于民主政权形式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即由抗战初期的国民大会发展为抗战后期的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②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这个联合政府不再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③这就为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奠定了基础。

至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依据中国实际斗争情况，出色地解决了抗战民主和抗日政权问题，制定出一整套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具体政纲，为今后的斗争指出了正确方向。

（二）把政权问题同革命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

建立革命政权是为实现革命总任务服务的，不是为政权而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权，为民主而民主。延安时期党和革命的总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权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和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使命的学说，并且运用这一学说于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从而把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活动纳入到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巧妙结合的又一典范。

（三）提出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一贯正确地估计了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本性。早在1926年他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就确切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两面性。在此后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坚持并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本性。所以，毛泽东历来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要联合，对它的妥协性也要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联合。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从未排斥，始终采取团结、联合的方针。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多党合作建设联合政府问题。进北京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再次重申延安时期所阐发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进城后多党合作的思想。他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①

（四）在取得政权的基点和道路上，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放手建立边区政权的方针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抓住发展进步势力这个基本立足点，结果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刻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把发展进步势力提到战略的高度，认为立足于发展进步势力，不只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而且是全党工作的总方针。他多次指出：所谓发展进步势力，就是放手发展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这些正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内容。

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重申了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一部分一部分地砸碎，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局部砸碎局部夺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手中夺取政权，呈报国民政府承认这种半合法的夺取，是对马列主义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学说的极大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是完整而丰富的。在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的形势下，毛泽东敢于正视现实，决定走曲折的路，在争取民族战争胜利的艰苦斗争中，从不放松为民主革命总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善于从变化的矛盾中及时调整和改变政策，如抗日时期对地主的政策，使之适合于抗战的需要；第二，他强调政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应随着革命任务与阶级变动的状况而完善和丰富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第三，他的局部砸碎的思想，重视在政权建设上量的积累，这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必须做细致的工作，准备走曲折的道路，等等。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决策思想，除了研究这些学说本身之外，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极为重要的。

四、政治思想及其决策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

毛泽东在陕北 13 年的突出理论贡献，是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对抗战和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的思想。

（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抗战实行政治领导的理论

抗日战争是一次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两党血战 10 年之后，老的阶级敌人还在伺机“剿共”，一个新的民族敌人又悍然闯入。形势极为严峻，共产党人随时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起初，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在被迫抗日之后，仍念念不忘消除异己，不时发动反共高潮。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如何解决国共矛盾、共同抗日问题，如何从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解决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问题，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迫切而复杂的课题。在延安的前 8 年，毛泽东倾其极大精力研究抗日战争的规律，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必须而且可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做了深刻的论述。

首先，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责无旁贷。毛泽东在对新时期各阶级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党，它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一旦时局有变，就会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表现，早已表明它不会放手给人民以抗战民主，由它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绝无可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出结论说：“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

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①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昭示着只有党才能领导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回顾了8年来党坚持抗战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121万党员的强大的党；有一个包括9550万人口，91万军队的强大的解放区；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有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在分析了这些条件之后，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②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早在抗日之初，毛泽东就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③毛泽东坚信，只要共产党员在各个战线上都能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就能动员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就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再次，从理论上解决了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武装了全党的思想，使共产党人自觉投入抗日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10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522页。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们是同国民党政府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这就发生一个我们是不是在替国民党政府“保卫祖国”的问题。这层关系必须理清，否则会影响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斗志。毛泽东及时地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认识问题。他指出：必须分清谁是侵略国家谁是被侵略国家。中国，由于是被侵略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①

只明确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关系，还不能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国共两党的又团结又斗争。为此，毛泽东又阐述了阶级斗争同民族斗争一致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②即，阶级的政治要求在抗战时期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③当前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必须坚持“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④

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关系，要求共产党员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从而保证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5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③ 同上。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

（二）阐述了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的理论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除了时代条件之外，决定的因素在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大量的理论工作，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出一条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了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国情之后，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完成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任务的历史责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当。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要求、阶级阵线、时代特点和革命前途之后得出结论：“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① 这一时期他从事了大量理论活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就是这一理论的最高成果。

（三）制定了一整套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领导的理论和方针

他首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端正党风，以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从基本理论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

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未被全党所承认，教条主义的东西还大有市场，全党理论水平不高，许多行动被一种蒙昧幼稚的东西所支配。不改变这种愚昧状态，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就无法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抓紧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机，适时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集中解决对待马列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义的态度问题。

在党内，是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当作圣经，只能背诵，不准改动，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把马列主义本本上的个别字句当作灵丹圣药的蒙昧状况，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正因为如此，必须在全党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必须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际，努力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条件下，全党更要研究民族解放战争的实际，以便勇操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他严肃批评了浓厚存在于党内的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认为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②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主观主义在党内流传，那就不仅不能领导抗战到最后胜利，也将葬送整个革命事业。为了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敌人的压迫，他要求全党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兵精武器好，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

整风运动的开展端正了党的思想，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被全党所接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公认为党的行为准则。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最大贡献。从此，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指引着中国革命一往无前地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其次，培育了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领导全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加强党自身的作风建设。早在抗战爆发不久，他就号召共产党员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做民众的朋友，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40年代初，又向全党提出整顿党的作风，以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到党的七大，他将党在八年浴血奋战中培育起来的新的工作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即党的三大作风。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而要实现这一结合，必须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对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通过思想教育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这是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也是检验党是否成熟的显著标志。紧密地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显著标志。我们党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代表了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人民信赖我们，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事业的不可战胜的根基也在这里。毛泽东还首次提出检验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这就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

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①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业中，每一个共产党人都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毛泽东的谆谆告诫，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敌人，终于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葬埋。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一个除了人民利益之外不谋求任何私利的党，有坚强的自信心，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它就不应该也不可能难于丢掉违背人民意愿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难于抛弃自身的错误。共产党人在恶敌面前是一个强者，在战胜自身弱点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勇于自我批评的强者。

从本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本国革命实践，任何时候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党自身，这就是党的三大作风的精髓所在。它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为实现党的领导构建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牢固基础。

延安 13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延安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八年抗战，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才不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人民军队由抗战时期的不足 6 万人发展到 120 万，共产党由原来不足 3 万党员发展为拥有 121 万党员的大党，解放区也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遍及 19 个省的 19 块解放区。党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6 页。

军力和解放区的壮大，雄辩地证明了抗战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的正确，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延安的最后岁月，正是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自觉实现了解放战争向全面进攻的转变，才有了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伟绩；正是由于对新中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系统提出，才有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中国基本政策的制定，才有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完整提出，也才有了全中国的解放。延安，不愧是中国革命胜利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走向全中国的奠基石。

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本书仅选取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并以此粗浅的认识，表达我们对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纪念。

第二章 制定抗日战争正确的政治路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新起点。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抛弃了过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做法，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更加清醒地思考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国内战争阶段转为对日战争阶段。在这历史转折的前夕，刚刚摆脱国民党“追剿”和党内错误路线统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政治路线。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34年至1936年，……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①这一政治路线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紧急关头找到了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关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探索，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时，刚刚担任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崭新的思路和宏大的气魄探索和规划了党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

新时期的政治战略，做了大量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为党的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国情认识和阶级分析基础、思想方法基础和战略理论基础。

一、大变动前夜的国情认识和阶级分析

客观地考察革命运动所发生的实际环境，科学地分析当前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是制定正确路线的起点，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分析，是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基本依据。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向全党阐明新的政治路线，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分析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应当转变的客观依据时，把它分解为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敌我营垒的对比三个要素。毛泽东不是把这三方面的情况简单地平列出来，而是从抓住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入手，分析由此而产生的各阶级政治态度和关系的变化，进而科学地、准确地做出了敌我营垒的比较，最终得出抗日应是我党当前的首要任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正确结论。

（一）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

一个领导当代政治革命的政党必须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找出形势发展的基本点。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进攻，不久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1月28日又进攻上海。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步伐，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吞并华北。日寇侵略行动的升级使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

的殖民地。”^①毛泽东对这个论断的具体分析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独霸整个中国，决不会因在东北、上海、华北得手就到此为止；二是由此引发了国内的政治风云激荡，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正处在民族革命高潮的前夜。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逐步沦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利益争夺，造成一种“均衡”态势，使中国还保存着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但是只要中国政治经济腐朽落后的状态不改变，中国不能真正自强起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环伺之下，这种均衡态势和半独立地位迟早是保不住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倾向，对中国具有最大的威胁性。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中国和俄国后，加速了军国主义化，它推行军事殖民政策的首选目标，就是富饶而又衰弱的邻国——中国。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密奏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中，公开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将以武力保持对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反对其他国家插足中国。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就进行过一次独占中国的尝试，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而未能得逞，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后在关外暂时止步，又给了一些主张以退让求苟安者些许安慰。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本性如此，不实现彻底独霸中国的国策是不会罢休的。1935年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页。

冀东事变显示了“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①

中日冲突的激化，使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变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在东北和冀东，广大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和抗议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妥协退让；1927年附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政治力量，也开始改变其政治态度；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开始发生分化。南京政府遇到空前的政治危机，蒋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特别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示威游行，他们喊出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引起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人们对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日益不满，国内大范围的政治冲突也将达到激化的临界点。中国正面临着大变动的前夜，一个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抗战前夕，对形势基本特点的认识上，国民党长期坚持一种荒谬的观点，它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长期视而不见；对于由此引发的国内民众抗日民主政治运动，则说成是“赤党煽惑”的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认为，“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事后，蒋介石把日本帝国主义粗暴的武装入侵当作一般国际冲突，诉诸国联“以待公理之判决”。此后，蒋介石派密使赴日谈判，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

使竟声言“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 18 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在日军进攻上海、侵占热河、挑起华北事变时，国民党一次次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以为这样就可以止住日寇步步进逼的侵略步伐。到了 1935 年 11 月，蒋介石的口气才有所转变，他感到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威胁，但仍不认为中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实际上对日本侵略者仍抱有幻想。蒋介石既然一厢情愿地把日本侵略者的行动看作短期行为，就必然把共产党看作是威胁其独裁政权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日寇铁蹄已踏进中国领土时，他继续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动数十万大军“围剿”红色根据地；他拒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以及对南京政府内战政策的不满，是国内民众抗日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把它诬之为“赤党”煽起的“内患”，悍然进行镇压。蒋介石的对日退让、对内镇压政策，使国内危机更加激化。

随着日寇的加紧侵略，形势更趋严峻，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民众，甚至国民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这就成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高层进行了频繁的接触，逐渐在政治形势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外敌入侵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极大威胁，举国上下必须一致对外方能免于灭亡。达到这一共识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独占中国的野心已昭然于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显示了其正确性和预见性，毛泽东对政治形势基本特点的分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路线的出发点，也成为国共两党

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认识基础。

（二）新形势下的阶级分析

一个政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个政党不能不把阶级的分析作为其政治决策的最基本依据。实际上，政治形势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动和相互间关系变化的状况，政党对客观形势的考察最终要落在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上。只有明了各个历史阶段的阶级状况，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才能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尤其是这样。毛泽东历来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多次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它作为探索中国革命政治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中应当特别注意无产者、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等阶级或阶层的状况。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再次对这些阶级（阶层）进行了透辟深入的考察。

既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行动“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阶级是不一致的，同一阶级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态度也会发生极大的转变。毛泽东以各阶级的历史状况和当前处境，现实的政治态度和可能的变化为根据，将它们分为四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直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的沉重压迫，长期以来就有着反抗的传统。“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工人和农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

者。他们遭受日寇疯狂的掠夺、残酷的屠杀和粗暴的蹂躏，成千上万的人家园毁灭，被迫流亡。日本的侵略还造成中国的经济危机，致使全国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因此，“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①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国农民一样，有着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他们也身受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长期压迫，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了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恶化以外，而且“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因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② 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掀起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就是证明。

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态度是“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基于这种态度，“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这个论断后来为南京政府的主要首脑，亲日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降日组成伪政府的事实所证明。西安事变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亲英美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尚未表露明显的坚决抗日意向，他们所奉行的是对日退让、对内镇压的方针，因此毛泽东把蒋介石看作卖国贼的总头子。但毛泽东同时又指出，由于买办资产阶级内部分属于不同帝国主义的派别，当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时，代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因此，随着日本帝国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

② 同上。

侵略行动的升级，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迫抗日就不是没有可能。

毛泽东为新的政治路线奠定阶级分析基础的最关键部分，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①需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考察。

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自身的独特的利益。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而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危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又怀疑、反对革命。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存在着软弱性、妥协性，其最大的特点是动摇，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就脱离革命统一战线，站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然而，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得到的只是民族工商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1927年上台的蒋介石国民党，很快就将其政治和经济重心建立在勾结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基础上，曾为蒋介石上台效过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换来的是以怨报“德”，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之外又新增加了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扼杀。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步步进逼，更极大地摧残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根据1933年的统计，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四省后，夺得了中国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9%的石油产量等等，使中国失去了重工业基地，也使关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这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还控制了河北、山东、山西的棉花生产，吞并了天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

唐山、上海的许多中国纱厂，垄断了华北的金融和矿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量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国民党政府的摧残，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大批纱厂破产倒闭，其他如卷烟、面粉、火柴等工业也陷于萧条、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在殖民地化的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出于自身利害关系，他们不会长久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不会继续依附于奉行对日退让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极有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以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进行了透彻的剖析。

第一，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不是完全同一的东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①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一般地说，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这一点是与地主买办不同的。

第二，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区别开来。民族资产阶级绝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一部分人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土地关系联系密切，因而有较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②那些没有上述关系和关系较少的一部人，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在今天的时局下”，这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③

第三，要把“九·一八”事变以前和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治态度加以区别。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恒定不变的，“九·一八”后，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加深了，因而就有政治态度逐渐转化的可能性。

毛泽东运用具体的、变化的观点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科学地分析他们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政治倾向，为党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两个营垒的变化和力量的消长

毛泽东对新形势下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变化的分析，为正确估量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的力量准备了重要的前提。对日本的侵略和汉奸的卖国，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坚决要求反抗，小资产阶级也要求反抗，民族资产阶级在当前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会发生矛盾和破裂，那么，“把这个阶级关系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①

民族革命营垒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红军。经受了艰难困苦复杂环境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后，内部更团结、更统一，成为一支蕴含巨大潜力的政治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剿”，胜利完成长征，并扩大了陕甘根据地，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英雄业绩。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他们构成了革命营垒的基本力量。少数民族，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威胁之下的内蒙民族，正在起来斗争，革命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

知识界、政治界著名人士的政治态度也日益向抗日、反内战、反迫害方向转化，越来越接近革命的营垒。例如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蔡元培，1927年曾站在拥蒋反共一边，支持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改变了政治态度，开始对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不满，他在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

关于反革命营垒，毛泽东做了两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反革命营垒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首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国民众坚决要求反抗的压力下，中国的反革命营垒正处在分化的过程中。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脱离国民党、大资产阶级，英美派和亲日派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分化。“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率领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勇敢地抵抗了日本的武装进攻。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去“剿共”，这支有抗日传统的军队拒绝内战，于1933年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与此同时，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开站到了民族革命的营垒中。其次，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破坏了列强之间的某种均势，遂引起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而遭到孤立。所以说，“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另一方面，反革命营垒暂时还比较强大。下了凶横直进决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中国的土豪劣绅、官僚买办组成的卖国贼营垒，则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构成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它们手中掌握着远远超过革命势力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并且和国际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目前正呈现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①

根据以上的分析，毛泽东的论断是，“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② 敌、我营垒的趋势是此长彼消，但是革命的力量还相对弱小，还不具备“决战的力量”，要创造决战胜利的条件，就必须依据变化了的形势转换思路，采用科学的方法正确制定政治决策。

二、政治决策的科学思想方法

依据客观实际，正确地做出决策，需要寻求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形势复杂严峻，中日战争行将爆发之际，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哲学，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后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那个时期，毛泽东研读哲学的执著程度和所花费的精力是惊人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回忆他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时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页。

谈。他花了三、四个晚上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① 在毛泽东认真研读过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和各种符号。毛泽东研究哲学，目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从而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找出解决中国革命诸问题的办法。而抗战前夕毛泽东倾注大量精力研究哲学，最直接的动因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紧迫需要。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抗战初期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② 这种现时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复杂严峻的形势提出了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要求党必须及时、正确地加以解决，而“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实事中指明正确的道路”。^③ 任何复杂事物的运动，必有内在的规律可循，只有了解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才能决定正确的前进方向。如果仅仅局限于直接经验，不从理论的高度上把握事物运动过程中矛盾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趋向，对革命的指导就必然是盲目的或短视的。从毛泽东在抗战前夕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所做的大量批注中，可以看到他试图从哲学理论高度上着手解决的大量现实问题，诸如中日矛盾的地位，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国共两党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种种战略策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当前中国具体复杂的实际，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② 转引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从根本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就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使党的政治主张更带有规律性和科学性。

其次，为正确形成和贯彻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必须清除错误思想，特别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使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全党上下牢固地树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内曾几次出现过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30年代前期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统治地位，但它的教条主义思想根源还未肃清，还在影响着党内的一些同志。当此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主张——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正极大地妨害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任务的完成，必须坚决与之斗争。而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教条主义在哲学上的特征往往表现为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把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实际之上；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代替对特殊事物的具体分析；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把相对的、可变动的对立双方当作绝对的、凝固的东西；割裂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用片面的、表面的眼光分析问题。清除和防止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是挖出它的思想根源并予以纠正和肃清，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从上述需要出发，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实践活动。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大量政治、军事论文，特别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了在全党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提倡党的高级干部学理论、学哲学，

经常在自己的住所召集哲学座谈会。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开始为抗大学员系统地讲授哲学，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抗战前夕艰苦的哲学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产生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有深远意义的哲学论著，同时也从根本上论证了党的抗日战争政治路线的一系列问题，奠定了全党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

·（一）实践的观点——关于正确政治主张的来源

一个政党关于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主张的提出，是依据抽象的理论原则，还是依据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还是不变的教条，这是教条主义和正确思想路线在认识论上的分歧。

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异常复杂尖锐的，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与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去甚远。在这样一个国情极其特殊、矛盾极其深重的国家进行革命，预示着道路将极其艰苦曲折。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要完成这一重任，党面临许多难以回避的困难：①如何进行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②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不成熟，给借鉴带来困难；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时尚短，而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投入实际斗争，缺少充分的理论准备。由于这些原因，党的早期领导人往往容易迷信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和结论当作不变的教条，而忽视了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灵活应用。这就在党内逐渐形成与机会主义相适应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在1927年以后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时，开始认识

到这种错误思想方法的危害。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党内率先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从哲学的高度挖掘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但是，这一观点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遭到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批判，被说成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这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只懂得一些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知识，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规律，不承认中国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曲折性，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热衷搞城市暴动，搞“最后的决战”。从1927年以后到1934年长征之前，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使党、红军、根据地遭到惨重损失。党内之所以不断产生“左”倾错误，究其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从遵义会议到抗战爆发前的历史转折期，毛泽东深切地感到肃清存在于党内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阐明并确立正确政治路线的客观认识依据的重要性紧迫性，为此，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就成为他着手解决的第一个哲学命题。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从哲学上阐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做了科学的概括，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正确的认识 and 主张只能从客观实际中，从实践中产生；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的认识也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实践又是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的目的，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这三个方面又不是互不关涉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毛泽东把它概括成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相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在《实践论》阐发的这些观点，从他开始思考新时期党的路线任务起，就一直在身体力行着。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详尽地考察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政治形势、阶级状况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奠定了新的政治路线的客观认识基础。与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场相对立的是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它们那里，主观和客观是分离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不是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是迫使实践去适合理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种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① 这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② “九·一八”事变后，“当前的现实”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大多数人的实践”显然是全民族奋起抗日。“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不看这个事实，仍然坚持“打倒一切”、“四面出击”，丧失了转变革命战略的时机。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由于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满口革命词句，常常能迷惑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它的影响和危害也就特别大，因此，当党根据形势变化确定新的政治路线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反对‘左’翼空谈主义”，在党内确立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①以使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

（二）矛盾转化的观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1937年4月以来，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时，开始从哲学上分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他所做的批注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考：“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②“问题：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③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第一次使用“主要矛盾”这一哲学术语来分析政治形势：“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④在后来的《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透辟地论证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揭示了事物运动过程中矛盾的多样性，矛盾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在同一事物的诸多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理。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学说，为掌握社会政治变革的基本规律，正确制定党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3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页。

入了一个激烈多变的时期，矛盾运动的情形非常复杂。首先，它包含着众多的矛盾——有中国社会的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其次，这些矛盾处在激烈复杂的运动变化之中，各种矛盾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在中国社会的众多矛盾中，有两种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一种是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决定的。但是，“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① 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矛盾的主次地位会随着运动带来的变化而互相转化，当帝国主义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通过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间接地压榨中国人民时，中外民族间的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相比，不具有尖锐性，因而处于次要地位。1928年至1931年之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形成了强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出卖中国的利益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② 因而是革命阶级的主要对立面，国内阶级矛盾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国内战争的依据。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使民族矛盾进入激化状态。中日矛盾的尖锐化使国内原有的各种矛盾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317页。

系急剧变化，“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① 这种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②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矛盾突出来，成为主要矛盾，有的矛盾暂时退到次要地位，成为非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矛盾尖锐突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这样，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则突出表现为中日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族解放战争阶段，决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抗日，夺取抗战的胜利。

（三）矛盾特殊性原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解决中日矛盾的唯一方法

从哲学的观点看，对当前主要矛盾的认定并找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构成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根据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已经做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的判断。为了正确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认为必须抓住它的特殊性，从分析矛盾特殊性中寻求合乎实际的解决方法。

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各种事物具有不同的本质，它们的运动形式是千差万别的，其原因就在于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特殊的矛盾。“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③ 也就无从找到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必须采用针对其特殊性的特殊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1927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斗争，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①但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了解革命各阶段矛盾运动形式的不同，不了解诸种革命性质的不同，只会千篇一律地使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尽管他们的“教条”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实际做法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其结果必然处处碰壁，使革命遭受挫折。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矛盾，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方法去解决民族战争时期的矛盾，就是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产物。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一切，不考察矛盾的特殊性，不遵守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这一辩证法的原则。

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考察当前发展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的。首先，把握矛盾运动的阶段性。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随着矛盾运动的发展，有的矛盾逐渐激化，有的矛盾暂时缓和，于是形成各个不同的特殊阶段。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并进一步入侵华北，激化了中日矛盾，现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就表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其次，善于分析现阶段中矛盾的各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3—74页。

个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与民族革命阵营是民族矛盾中对立的两个方面。强大的反动势力目前居于矛盾主要方面。而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展得很缓慢，目前中外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处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要把不平衡的状态转变到大体平衡的状态，要使革命的力量能够抗衡或超过反革命的力量，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①就是现阶段矛盾的特殊性。

特殊的矛盾，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去解决。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革命现实力量的相对弱小，要求党适应情况，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根据现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明确了主要打击目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只有牢牢地掌握主要矛盾，才能不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惑，始终准确地打击主要敌人，达到民族战争的目的。如果不深刻认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不去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友军，就不可能击中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其结果势必分散打击的目标，“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②现阶段革命实践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无法完成。而只有建立广泛的抗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民族统一战线，以此种特殊方法解决现阶段特殊矛盾，才能使革命力量由弱变强，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掌握斗争的主导权，再加上国际和平阵线的因素，中国方面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不利态势，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① 这就是正确的结论。

当中国社会已经由于矛盾的转化而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阶段时，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使全国各阶层的民族民主情绪飞速高涨。尽管革命的力量暂时还弱于反革命的力量，但必须看到，抗日民主的革命运动正在由局部迅速扩大到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或接近民族革命营垒。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将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代表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它们将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有了这样坚固的基础和支柱，统一战线必然会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拆台阴谋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关系，造成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豪绅和国民党集团的分化，这就使过去曾是中立的人们，过去曾被裹挟在敌人营垒中的人们，甚至过去是敌人而今天是抗日友军的人们，都有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群众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还扩大了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裂口，这就使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成为可能。上述种种可能性，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转化为现实性的。

三、新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新的政治路线，到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夕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这条政治路线。在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伟大的政治战略转变。这个转变的思路是毛泽东等人根据对当时客观形势所作的缜密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提出来的。根据形势的演进，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努力，使得党在抗战前夕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中，始终掌握着主导权。党在抗战前夕提出的战略思路和策略方法，为把民族解放战争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最终夺得民族民主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抓住开拓新局面的关键，实现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变化”，毛泽东特别强调，“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

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① 在红军到达陕北之际，中国共产党正是面临着情况急速变化这样一个新阶段。

遵义会议之后，新的党中央面临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步伐，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严酷事实引起一轮新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国内一切派别在这个现实面前均面临着重大的政治抉择。一贯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变动，为迎接这个大变动，党的战略策略也须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毛泽东等人曾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名义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并与国民党抗日将领蔡廷锴等人发起的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定。

当时，全国要求抗日的声势十分浩大，一些国民党内反对派及中间派别也都活动起来，要求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继而上台的孙科声言要与共产党、红军妥协。此种客观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如果党能把握住机遇，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必定会掀起高潮。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人却始终坚持教条主义的、僵化的政治战略。首先，他们以主观主义的分析去任意裁剪客观形势，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战略任务。“左”倾领导者无视“九·一八”后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不把民族战争放在当前的首要地位，而是把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帝、反资、反封并列；他们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对中国的威胁骤然增大，继续强调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一致性，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无视革命的力量还相对弱小，认定目前是“直接的革命形势”，急于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欲使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他们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寇攻占我国东北说成是针对苏联的行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些完全脱离中国现实实际的判断和决策，形成遵义会议以前的“左”倾冒险主义战略，几乎把中国的革命引到绝路上去。

其次，坚持关门主义，实行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概视作打击目标，在民族危机面前把大批可以团结的朋友推向敌人。长期以来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就存在着偏差。党的“五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的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党的“六大”纠正了“五大”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错误提法，但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由于“五大”、“六大”分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半个月和一年后召开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附合了那场政变，所以，这些过火的提法还算事出有因。然而“九·一八”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分化和转变，王明等人却无视这个变化，仍然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中间势力。他们不仅不承认蔡廷锴、蒋光鼐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反而宣布“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左”倾机会主义者还指责冯玉祥等人的爱国行动是利用士兵与民众的抗日情绪，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夺取北方的地盘，因而都是中国劳苦群众的敌人。他们又断定福

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和政客们企图用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的把戏，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什么两样，从而拒绝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①

在“左”倾错误战略策略的指导下，党和红军奋力进行力所不及的斗争，处处陷于被动，不断遭受损失，致使一度高涨的革命形势逐渐跌入低潮。事实证明，按照“左”的一套行事，革命的道路越走越狭窄，要重新掀起革命的高潮，就必须要有新的战略思路，新的策略方法，“像过去那样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②

在结束了党内“左”倾错误统治之后，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新的政治战略思路，要求紧紧抓住当前时局的关键，以发动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民族斗争为契机，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③第一个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和曲折性。因此，革命的道路不会是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也不可能是纯粹又纯粹的。中国革命必须经过一个发动全国人民、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全国人民抗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190页。

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把民众集聚到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把国内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先消灭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把群众导向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不是向后退，而是革命发展曲折性的必然要求。所以，当前开拓革命新局面的关键就是抛弃过去那种不分时机阶段，不分轻重主次，急于打击一切的“左”的做法，迅速由土地革命转向民族解放战争，把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规定为党的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坚定明确地写道：“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①

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任务相适应，党中央提出调整政权目标，以“人民共和国”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这同样是由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曲折性决定的。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无论是“工农民主共和国”还是“人民共和国”，党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目标并没有改变。但是，“人民共和国”更适合于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更适合于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政府。这是因为1927年以后，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退出了民主革命，变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只剩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政治组织责任不得不单独落在共产党肩上，革命的政治基础不得不建立在上述三个阶级的联盟之上。当历史风云由土地革命转为民族解放战争时，由于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应当拒绝他们，而应当招致他们，恢复共同斗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0页。

争的联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因此，党的政权目标应当是体现全民族联合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① 人民共和国的纲领，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由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民族的，它必然会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使抗日的民族联合阵线更加巩固，从而有利于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并由此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光明前途。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战略构想，表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开拓新局面的关键，不失时机地完成了政治战略转变，也就在抗战前夕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二）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牢牢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1927年以来，国民党占据着中国执政党的地位，它掌握全国大部分物质资源和军事力量，并且长期以来实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要建立有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必须停止内战，推动国民党抗日。“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而首要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② 因此，共产党必须妥善解决好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而国共合作是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后才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等人准确地分析了国民党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及时地转变政治策略，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抗战前夕最大的政治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选集》，第7—8页。

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瓦窑堡会议前后，我党仍然把蒋介石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样看作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但这次会议同时又做出了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代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可能改变对日态度的估计。毛泽东在会后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也详细深入地分析了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国民党营垒中的分歧和斗争，指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这就为今后发展统一战线，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中国共产党促成国共合作首先是从分化国民党营垒开始的。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合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争取东北军放弃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并组织力量积极在东北军内开展宣传活动。这些工作不仅争取到东北军下层官兵，而且影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上层将领，为以后的西安“兵谏”，“逼蒋抗日”创造了条件。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日益不满，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声音日益增强，考虑到形势的变化，考虑到“反蒋”的口号很难为那些已经赞同抗日的国民党将领所接受，为了扩大抗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力量，毛泽东和彭德怀于1936年4月在晋西前线致电党中央，建议修改“反蒋”与抗日并提的方针，强调我们的旗帜是抗日，“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1936年5月，党中央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并宣布我党放弃反蒋口号。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声明要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这说明国民党集团在日寇不断进逼，国内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于是，中共中央直接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议国共各派代表谈判，以实现两党抗日的民主合作。毛泽东还曾写信给蔡元培等社会知名人士，要求他们向国民党当局进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对外退让、对内苛求的亡国方针，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毛泽东并致书宋庆龄，要求她利用国民党中委身份，“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①10月，毛泽东宣布红军单方面实行停战，党的策略口号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这些政治举措使我党大大赢得了民心，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积极调解，使中国免去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并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的政治条件已趋于成熟，毛泽东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日，他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①党的策略方针遂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及对日本的政策。会议前夕，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五项要求：（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为促成国民党同意上述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同时提出四项保证：（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②毛泽东指出，“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些保证，是必须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③毛泽东驳斥了认为这样做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强调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共产党的让步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原则是共产党不放弃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条件是国民党必须停止内战，坚持抗日，因而这种让步是主动的、带有积极意义的让步。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国共两党僵持不下的政治局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9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2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

面，掌握主导权，使形势向我们预定的方向发展。

党的这一重大政治步骤，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和冯玉祥等，响应中共中央的建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这个提案虽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而未获通过，但会议的决议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等等，表明蒋介石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表明国民党逐渐改变它的政策，转向团结抗日的立场。当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三）党要切实地担负起政治领导责任，把民族革命战争引向光明的前途

在抗日统一战线行将建立，全民族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毛泽东着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责任问题。

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它理所当然地认为，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权必须无条件地归之于它。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坚持长期奉行的政治专制主义，企图继续使各党派、各阶层及人民大众处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国民党仍然千方百计企图削弱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削弱共产党本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甚至还通过了一项《根绝赤祸案》，其中的一条内容就是停止“赤化”宣传。在关于两党合作的谈判中，国民党在“编共而不容共”方针指导下，要求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的领导，放弃

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共产党为争取团结抗日，曾对国民党做出若干重大让步，但在有关政治领导权的原则问题上，是不允许让步的。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正是由于各政治集团合作抗日，全民族共同参加斗争的情况，才更“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①这是因为：

首先，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在革命中就常常表现出软弱性和动摇性，它在某种历史时期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就有可能动摇变节，1924年到1927年以后的一段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还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和保守性，1933年以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很长的时期内不能接受，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已经判定，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坚韧性和彻底性，克服资产阶级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才能保证民族解放斗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一定不要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必须坚定地把自己的责任担负起来。

其次，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②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联合的抗日斗争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将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国内所有抗日的各阶级和阶层，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民族革命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线内部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国内绝大多数阶级阶层都有共同的抗日要求，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经常产生种种摩擦和斗争。特别是代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总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压迫各劳动阶级，排挤中小资产阶级，这就会削弱团结抗战的基础，使统一战线存在着破裂的可能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民族阵线的政治中坚。因为包括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抗日联合阵线，它主要不是体现资产阶级国民党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体现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所做所为是代表全民族的，它就能够通过适当解决各种矛盾，使统一战线顺利建立并巩固扩大。

再次，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转变论者，主张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去。抗日民族斗争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理所应当同中国共产党的长远政治目标结合起来。在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赞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及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①无产阶级只有坚决地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创造必要的条件。

总之，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巩固，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民族战争就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斗争中的领导责任，重要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首要的一条“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①“新的形势引导到新的口号，新口号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②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斗争一步步推向前进的重要方式。

红军到达陕北后，针对国民党顽固“剿共”，坚持内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提出“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经过艰苦的努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实现了这一政治目标。毛泽东指出，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矛盾给党提出了新任务，必须把革命的车轮推进一步。

以西安事变和1937年2月的三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在政策上有了转变，国内取得了和平。但这种和平是不巩固的，“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曾奉行了10年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现在虽然已经开始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通过敌视共产党的《根绝赤祸案》就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还继续对人民抗日运动采取高压政策。1937年4月间，它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沈钧儒等7名爱国人士进行了审判。这些，给国内和平和正在勃发的全民抗日运动罩上一层阴影。为了努力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中国共产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6页。

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对这个口号不理解，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①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说法。

毛泽东认为，抗日和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为民主即是为抗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②而国民党的种种独裁和专制政策，正在破坏国内的和平，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动员人民。如果依照“只要抗日不要民主”的主张行事，其结果必然丧失抗战胜利的政治保证。

正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③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导向这一光明的前途，而不是回到黑暗专制的过去。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的每一步策略目标逐渐接近这一前途，而不能停留在原地，更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毛泽东把争取民主的目标具体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实践证明，毛泽东依据形势的变化所提出的政治口号和目标不仅为全民族的抗日斗争打下了政治基础，而且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全国人民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卷，第108—1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第三章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坚持独立自主方针

一、不可避免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然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路线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能正确认识 and 解决抗战开始后，抗日阵营内部依然存在着的严重而复杂的斗争，就不能顺利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抗战初期的政治形势，适时地论述了如何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几个基本问题，为抗日战争的进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一）对待抗战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段时间，国共两党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那么，七七事变后，便成为如何抗战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指导路线，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主张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动员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一条代表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

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坚持一党专政，主张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限制人民起来抗战，并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妥协。这是一条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二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实行第一种方针，并敦促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改变第二种方针，实行第一种方针。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才能适应抗日战争。”^①之后，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又指出：“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②对此，国民党竟不予理睬。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做出努力，于1937年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民党当局还不予承认。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6—3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

的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就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问题进行了谈判，终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无结果。后经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再呼吁和努力，国民党才在1938年4月初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这两个纲领反映出国共两党对待抗日的不同指导路线，反映出两种方针，两套方法。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包括这样一些重要内容：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做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

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首先，它是一个最彻底、最坚决的抗日救国纲领。这不仅表现在它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正确口号，而且提出了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其次，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的纲领。它主张国内各抗日党派，团体，军队一律平等，都享有抗日和参政的自由，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困难；它主张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人人为抗战出力，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法令和政策，给人民以抗日的充分自由；它主张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广泛的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指出了具体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指针。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共分7项32条。内列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项。这个纲领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都主张抗日，也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某些合理要求。但两个纲领有原则的差别。第一，这个纲领提出“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并把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依旧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统治，使抗战的胜利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胜利。这就为以后两党合作伏下了危机。第二，这个纲领反映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是不坚决的。全文只说“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而没有一处提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第三，这个纲领反对对军队、政治机构进行改革，并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作了许多限制。在敌后，国民党不许共产党有发动人民，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自由，不承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人民政权。在国统区，国民党对抗日群众运动实行统制和包办，事实上，不仅包而不办，而且就在通过这个纲领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解散了很多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体，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第四，这个纲领对于国计民生，虽然也规定了一些空洞的根本不准备实行的口号，例如什么“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等等，但对于真能实际给农民带来好处的减租减息、减轻田赋等，只字不提。此外，这个纲领规定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但也只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关。

《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文件，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所进行的一场殊死战斗。这场战争，到底是按照共产党的路线实行全面抗战，还是按照国民党的路线实行片面抗战，这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两条路线，会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

（二）两种路线、两个前途

毛泽东深刻揭露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严重危害：“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

国的。”^①这是因为，片面抗战首先表现在严重地脱离人民，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不给人民政治的民主和生活的改善；甚至借抗战之名大发国难财，使抗战成为掠夺人民财富、扩大其官僚资本的一种手段，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脱离人民并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此外，国民党当局采取的许多抗战措施，也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甚至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如1938年6月4日黄河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却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人民遭受灾殃，500多万同胞离乡背井。还有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未能损及敌人的一根毫发，却使长沙变成一片废墟。

其次，片面抗战表现在对抗战不坚决。国民党当局始终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主张抗日，一方面又主张与日妥协。如抗战初期，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实行战略退却，放弃一些土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恐日病”或对抗战态度不坚决，而实行“逃跑”方针，或将有秩序的退却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则是完全错误的。又如在抗战中，国民党当局为了同日本达成某种政治交易，在战场上也采取某种妥协行为等。再有，正面战场在军事上采取保守主义方针，处处据守，层层设防，只知打阵地战和消耗战，不知打运动战和歼灭战，更造成军事上的被动和失利。

战争的进程表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方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面战场没有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而且每况愈下，愈来愈糟。从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政府对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8页。

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广大爱国将士英勇杀敌，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比较大的战役，也取得了若干胜利。这期间，共毙伤日军 25 万余人，牵制日军约 60 万人，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正面战场总的来说是失利的，迅速断送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土地，损失了 100 余万军队，空军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几乎丧失殆尽。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突出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期间，正面战场上的一部分爱国将士，在南昌、随枣、枣宜、长沙、桂南、中条山、湘赣等战役中，英勇地抵抗日军的进攻，予敌以一定杀伤。但总的来看，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显著削弱，正面战场的作用和地位随之降低。一是，国民党政府军对日军的进攻大都采取避战方针，“敌来我挡，敌退我停”，很少主动出击，更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二是国民党当局在各个战区部署兵力均大大超过日军，但不论在防守还是进攻中，都未能以自己的优势兵力给敌人歼灭性打击，每次战役的损失均超过敌军。有些战役更因敌情不明，仓促应战，指挥失当，以致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如第二次长沙战役，日军总兵力约 12 万人，国民党政府军达 50 万人。战役结束，4 倍于敌的国民党政府军伤亡及失踪者多达 7 万余人，而日军仅伤亡 6800 人。三是这一阶段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抽调大批军队到敌后和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军事磨擦，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正面战场的防御力量，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如驻守晋南豫北交界处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

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①特别是1941年3月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箕豆相煎之机，积极准备进犯中条山，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驻守中条山的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进攻八路军。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周内国民党便损失了兵力不下7万人，将级军官被俘被毙者就有10余人。日军以1比20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占领了中条山区。“这次战役为松沪战役以来损失最大者，成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②四是由于政权腐败，军纪松弛，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军战区和集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训词中承认：“在抗战初期，我军三师人可以打敌人一师团；后来到徐州会战，我军质量渐差，须五师或六师才能打敌人一师团；到了现在，情形更可虑了！你们都知道，现在无论哪一个战区，敌人只有三、四个师团，我们要用十几师或二、三十个师兵力，还得不到怎么大的战果。”^③

抗战后期，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消极避战，坐等胜利的方针，使正面战场的情况比前一阶段更糟。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8个月时间，国民政府军损失60余万，丢失了土地20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造成正面战场的令人痛心的大溃败。虽然正面战场也曾取得滇西战役的胜利，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北，但并没有能挽救

①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7月），国民政府军全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395—1396页。

由于豫湘桂战役失败带给国民党的严重政治、军事、经济危机。1945年春天的芷江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将日军团团包围，准备歼灭。而蒋介石为保存力量，竟下令让开一条口子，把日军放跑。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这种做法，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谴责，而且引起他的美国盟友的不满。美国驻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1943年和1944两年中愈来愈深信，政府与国民党显然已失掉在抗战初期使他们赢得人民忠诚的十字军精神。据许多观察家的意见，他们已经堕落腐败，争夺地位权力，依赖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并保全他们在国内的无上地位。”^①

与此相反，就在国民党战场失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和希望所在。

两个战场的鲜明对照说明：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是胜利的路线，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路线是失败的路线，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很久以来，这两条路线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结束国民党领导集团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代之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得出的结论，也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迫切任务。

^① 《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1辑，第32—33页。

二、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

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面前，毛泽东指出，必须坚定地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毫无疑义，人民战争正是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因此，为真正贯彻人民战争的路线，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紧紧把握住人民战争在抗日时期的新特点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了。对此，毛泽东做了精辟的科学分析。

（一）在持久战中贯彻人民战争路线

抗战初期，战局复杂多变。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四处逞凶，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致使我半壁河山沦丧，亡国的危险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种复杂的形势，给予全国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以不同影响，他们也因此对于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被迫抗战的国民党，从一开始对抗战的胜利就表现出信心不足。他们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是一条妥协求和的路线。他们从“战必败”的荒唐逻辑出发，准备相机求和，走“战而后和”的道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些大溃败，更加剧了他们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则存，战则亡”的言论甚嚣尘上。亲日派代表汪精卫在徐州失败后，就实际上在准备着公开的投降。代表英美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主要担心“再战必亡”，企求妥协，但又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侥幸乐观心理，幻想借助于英美的援助取得速胜。当中国军队取得某些胜利，战局稍有转机时，他们便头脑发昏，视日本侵略者如草芥。台儿庄一战后，国民党一些政治派别居然断

言徐州会战将是中日的“准决战”，蒋介石甚至提出国际局势变化，苏联出兵，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因此，中国必定速胜，持久战的方针必须改变。一旦战事失利，这些人又视日寇为神物，变成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者。而一切亡国论者的实质，都是欲置民族于死地的民族投降主义。

“速胜论”和“亡国论”正是片面抗战路线在不同形势下得出的两个极端的结论。这两种错误思想反映到党内，就是以轻敌形式畸形表现出来的阶级投降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看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热衷于武汉会战，认定这是扭转战局的转折点。他们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幻想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

毛泽东严厉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根本改变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力量对比，争取抗战胜利，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战，希图在短时间内打败敌人是不切实际的。战争将经历敌处优势我处劣势，到敌我力量转换，到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的发展过程。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人民力量的发动与武装。所以，抗战必须实行持久战，人民是实现持久抗战的主人。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从理论上对持久战略方针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日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透彻地剖析了对持久战的种种疑问，以其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的信心，也以其特有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全面认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制定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客观依据。

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曾深刻地指出，为着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党不仅要研究

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当抗日战争进行 10 个月之后，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观察战争，鲜明地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就是说，时代和国情是认识战争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根据。毛泽东依据对时代特点和中日两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揭示出敌我双方根本对立的四个特点。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就是从这些特点中产生出来的。

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及政治上的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流的，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事和经济实力都远不如日本强大，人力物力资源在当时也不能充分调动起来。

特点之二是敌退步，我进步。这是由时代的特点造成的。20 世纪初，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企图凭自己的国力发动战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注定了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必然激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必然使自己处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包围之中。中国进行的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们不分地域、年龄和职业，被战争动员起来，一切为了民族而战，为了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战。

特点之三是敌小我大。这是对中日两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日本虽强，但是小国，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其人力、军力、财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7 页。

物力无法支持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时间拖得越久，国力的消耗越大。这是日本无法克服的困难。中国则相反，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大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了它能够克服暂时的困难，保卫民族生存的思想越深入人心，越能发挥出大国的优势，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军力充分挖掘出来，支持长期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特点之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一个贪婪无比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它与德、意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联盟。它们把侵略的目标对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对准了一切弱小民族甚至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它们就把自己放在了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上。失道寡助也就成为它们必然的归宿。中国是最早肩负起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国家之一。我们的抗战，不仅是保卫民族的正义战争，而且以拖住日本法西斯的正义行动，在事实上支援了其他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也就必然得到全世界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中国能够支持持久抗战的重要国际因素。

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特点的考察，既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全面的。敌强我弱的特点，规定着中国的抗战不能速胜，必须坚持长期抗战；大国、进步和多助的条件，又足以支持持久战。因此，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抗战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持久——必胜，这就是结论。

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却从唯心论和机械论的观点出发，对中日双方的特点做了片面的主观的分析。他们或者夸大敌强我弱的特点而无视于我有利的因素，或者夸大有利因素而忘记甚至不敢承认敌强我弱的事实，因此都不可能对战争的进程和前途做出正确的结论，只会使战争朝着失败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依据对敌我双方矛盾的深刻分析，科学地预见到持久

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中，敌人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我们则不可避免地会遭致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这是敌我对比诸因素开始全面较量的时期，敌我双方的弱点和优点在战争中充分显现出来，并受到战争的检验，在战争中得到发展。敌人虽可横行一时，但是，远离国土进行不义之战，士气必将低落，人员和军力物力的损失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这就必然削弱敌人的力量。而我们的抗战，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国土沦丧，军力和经济力削减，但却在反侵略战争中锻炼了军队，锻炼了人民，这就为我们坚持持久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反攻阶段的标志是敌开始战略退却而我则转入战略反攻。由于战局发展的不平衡，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就使得反攻将首先在解放区若干战场拉开序幕，从而呈现出反攻的地域性、局部性。我之作战方式将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阵地战已提到日程上来。在党的持久抗战的指导下，随着反攻的节节胜利，我始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配合以国际援助，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反映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指明了达到胜利的具体道路，也使人民战争的威力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在持久中走向胜利。

(二) 抗日游击战争是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最好形式

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祖国神圣领土的时候，每一个

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顾自己有无武器和军事才能，或者自动组织起来，或者在抗日政府和军队的组织下，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及其他作战地区打击敌人。抗日政府也分派部分正规军队担任游击任务。因此，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质，就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为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

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毛泽东认为必须采用游击战争这种最能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战争的形式，并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1.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是时代的产物，是持久抗战的需要。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从总体上说，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处于辅助地位。抗战的最后胜利，取决于正规战争。但是，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赋予游击战以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代，其标志就是有了为民族和人民利益而竭诚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广大觉醒并日益走向有组织的人民群众。时代的进步特征，对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无不直接关系到抗日游击战争的产生和发展。

就敌我力量而论，时代的进步性决定着双方强弱对比关系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法西斯严密组织的实力，在一定时期内，力量对比呈现出敌强我弱的态势。但是，日本侵略者面对的不仅是被迫抗战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而且主要的还有经过革命锻炼的坚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它将以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焕发出蕴

藏在民众之中的反侵略伟力，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以持久的游击战争，为侵略者布下天罗地网。因此，从本质上说，力量对比将必然是敌弱我强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广大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①

毛泽东还说，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所以就出现了有别于其他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情况，主要是：敌强我弱，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敌小我大，又使战争得以长期坚持；由此也就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具有战术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敌人占地甚广，将使大半个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变为敌人的后方，只有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才能打破这种严重的局面。因此，必须提高对于游击战争的自觉性，用游击战争克服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并切断敌人一切物力军力的补偿，为最后的反攻准备充足的力量和坚强的呼应。同时也要看到，敌人占地甚广，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敌是小国，兵力不足，占地一广，就暴露出难于严密控制的弱点，必然在占领区留下可资利用的缝隙，这就给了游击战一个广阔的活动场所，使其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做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又由于党的领导和军民的深入发动，又使得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必定是大规模的，这是区别于其他游击战争的重要特点。游击战在外线大规模地单独作战，就产生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5 页。

一套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因此，单纯从战术的观点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是远远不够的了。

战争的长期性产生了战争的残酷性。为了经受严酷的战争考验并取得胜利，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以作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游击战还要提高到运动战的水平，向运动战发展，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上述一切，都大大超出了战术原则的范围，使抗日游击战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2. 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是大众战和民兵战。

朱德指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①它是抗日的，以区别于其他国内游击战争；它是大众战和民兵战，以区别于正规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从本质上说就是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游击队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它得到全国同胞和一切支持正义的人们的同情、支持和赞助。抗日游击战争最便于发动和团结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日，起来自卫。有民众的广大发动，才有游击战可言；游击战又将把民众教育锻炼成坚强的抗日战士，以支持战争到最后的胜利。因此，游击战争就成为团结全国一切同胞为战胜日寇而奋斗的武装。在敌人后方发动和组织民众起来坚持抗战，是抗日游击战争义不容辞的责任。实践证明，失掉民众，就将万劫不复，民众运动越有成绩，游击战争就越能坚持，做到以群众为堡垒，依靠民众的伟大力量去完成伟大的民族战争。

抗日游击战的大众性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① 《朱德选集》，第31页。

敌后广大人民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尽其所能的物力、财力支援游击战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投身到抗日游击队的行列，以各种方式参加战斗。游击战争是民族抗日最高的斗争形式。民众唯一的要求是反对敌之野蛮侵略，积极打击敌人，保卫祖国和家园。为此，他们成群结队自动参加游击队，直接参加战斗。

抗日游击战即民兵战的特点，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广大的解放区，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妇女，都响应党建立民兵组织的号召，在自愿、民主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人民自卫军中，除精干分子以外，自卫军成员都参加到民兵的队伍中来。到1945年，各解放区民兵已达268万多人。民兵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在配合作战中，民兵发挥了自己的战斗威力，并为正规军的壮大提供了雄厚的兵力资源；其次，民兵善于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创造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击战”，“交通战”等新型作战形式，独立进行战争，可以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还有，民兵实行劳武结合的方针，边战斗，边生产，使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壮大。因此，民兵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基本力量。

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表现在，辅助正规战并向运动战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动之初，党和毛泽东就向我担负游击战的部队提出了配合正规战的任务。这种配合，首先是在战略方面。敌后广大地区游击战场的开辟，如东北、华北、华中等地，牵制和削弱了敌人，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从精神上给予全国人民和全国正规军以巨大的鼓舞，这本身就是对

正规战争的战略配合。在组成战争全局的一切战役作战中，游击战也有效地发挥了配合作用。例如，在忻口战役中，我游击部队不惜以重大牺牲，破坏敌军机场，切断敌人运输要道，起到了积极的战役配合作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八路军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到1939年5月，敌人在华作战的约40个师团的总兵力，就有18个左右的师团被游击战争牵制在华北和苏北，破坏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使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未能实现。正因为抗日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配合正规战的战略作用，就争取了相持阶段的到来；在相持阶段，敌后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与敌人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样性斗争，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保持了相持局面，而且为战略反攻准备了力量。总之，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象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着抗日战争的全局。

抗日游击战争的另一项战略任务，就是要自觉地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从1944年起，各解放区战场展开了攻势作战，开始了局部反攻。在晋察冀，八路军自1月至10月几乎每个月都攻入敌占城市一到三座，仅6月一个月，就攻入了6个县城。在晋冀鲁豫，从2月至12月，八路军先后攻入了19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复国土20多万平方里，解放人口500多万。与此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所有这些攻势作战，都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进行的，都体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结合、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发展。战争末期，当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顺利完成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就实现了。

可以说，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好最充分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运用于我国，运用于战争，认识并纯熟地掌握了适合我国情况的战争规律，完备地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党坚定地执行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推动全民族进行持久战，并以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来确保人民战争的顺利进行，持久战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论，都是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在抗日情况下的运用。它建立在对中日双方国情的科学分析上，最能适应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因而也最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出弱小的革命军队战胜强大敌人的奇迹。

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军迅速出现在抗日最前线。在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冀鲁豫等抗日敌后根据地。八路军配合冀东人民，发动了冀东北和唐山矿区的武装起义，发展了群众抗日武装，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华中，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开展长江两岸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南，先后组织起游击队，举行起义，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民兵和非武装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游击战争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日本侵略军不得不将进攻的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以其侵华总兵力的60%左右和伪军的绝大部分来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对着敌人的疯狂“扫荡”，我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充分发挥相互结合、协同作战的长处，英勇地抗击了敌人的残酷进攻。1940年8月，八路军在民兵和非武装群众的配合下，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25000

多人。这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寇，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百团大战以后，日本侵略者改变战法，集中兵力对我华北解放区实行“总力战”，推行“三光”政策，企图通过重兵反复“扫荡”，建立“无人区”，消灭我军赖以生存的条件。在敌后军民的努力下，解放区不仅度过难关，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1943年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3万余次，毙伤俘敌伪军25万人。1944年，各解放区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年8月9日，我军转入全面大反攻，在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作战共12.5万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歼灭、毙伤俘、反正日军527422人（不包括东北抗日联军毙伤17.2万余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最后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为贯彻人民战争思想，经历了艰巨的斗争。不仅要抵挡来自抗日阵线内部的严重阻力，而且要抵制来自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这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问题，也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必须完成的紧急任务。

三、反对两种投降主义

为了争取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鉴于党内外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战斗任务，深刻地阐明了战胜投降主义的策略原则。

（一）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

级关系

深刻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内部斗争规律，揭露民族投降主义的根源和危害，制订出对待各阶级的正确斗争策略，是克服民族投降主义，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抓住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回答。

首先，必须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同时又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独立为中心目标，这一目标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分极其广泛复杂，它是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党派、抗日团体。包括社会各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所有抗日的阶级和阶层，直至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抗日坚定性各有不同，相互之间又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冲突。特别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抗日；但是，他们的抗日是被迫的，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并坚持其反共方针。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冲突的焦点，集中在我党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上。仅从我党在抗战前后同国民党举行多次谈判的激烈斗争，可以看到，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手段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政权。国民党只允许红军编三个师，供给三个师的经费。改编后的红军必须由国民党行营管理，反对设立总司令部，只同意设政治训练处来指挥部队，并要向我军派副师长、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甚至想重施对待杨虎城的故伎，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来“做事”或出洋。显然，蒋介石集团想在组织上夺取战争指挥权，在政治上改变我军性质，并进而吃掉共产党的企图是非常清楚的。国民党要改陕甘政府为特区政府，归陕西省领导，行政

领导人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他们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取消党领导的边区政权。严酷的现实说明，无产阶级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严重地存在着，斗争非常激烈，只是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才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其次，应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而这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是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3年合作和内战时期的10年分裂之后的第二次合作。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国共两党都有政权和军队。作为在野党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但从总体上说，在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各阶层的政治力量是不平衡的。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居第二位，力量虽不大，但却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真正代表，因而在政治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其他党派的力量都是比较弱小的，在当时，第三党尚不足百人，国家主义派至多不超过四、五百人，而国家社会党和政学系都是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这种力量的不平衡，更增加了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

再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采取遇事临时协商的“东方式”合作。这种特殊局面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共产党曾做过多次努力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终未成功。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采取各党派民族联盟的形式，即由各党派若干代表，成立中央与地方委员会，依照共同纲领进行工作，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组织民族联盟，意味着各党派的平等合作，因而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即同国共双方各推相等的干部组成，蒋介石任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我党当然不能同意这种无条件的“最后决定权”，提出成立国

共两党委员会的方案。蒋介石开始表示认可，双方曾派代表进行过谈判，终因国民党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什么成效，两党委员会也始终没有正式成立起来。又如共同纲领问题，我党拟定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后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制定共同纲领的基础，再遭国民党拒绝。国民党企图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共同纲领，我党当然无法接受。

上述情况表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斗争是十分复杂的。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援助，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英美等国以及苏联，把抵抗日本侵略者、拖住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势力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上。因此，国际方面只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它们用大量的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这对于巩固国共合作，加速国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都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在透彻分析统一战线中阶级状况和内部斗争的规律之后，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广大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特别指出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① 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害怕民众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这正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准备做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蒋介石的亲信、亲日派的头子张群，在“七、七事变”后不久的庐山谈话会上公开叫嚷“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有的甚至狂叫“和则存、战则亡”的投降主义滥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民族失败主义，也即民族悲观主义，正是投降主义的根源，这种悲观主义认为在中国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了，殊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看不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看不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毛泽东认为，必须向人民群众讲明这个道理，并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这是克服投降主义的最好办法。所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的战斗号召：“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认清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①因此，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克服民族投降主义，抗日战线才能巩固起来，抗日战争才能胜利进行。

为有力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毛泽东在深刻分析统一战线中各个集团的基础上，规定了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三种势力的关系的基本政策。这就是扩大和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反对右翼集团的策略方针。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原则。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中心环节是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即发展进步势力。只有发展人民军队，壮大革命力量，才能有力量制止右翼集团的投降活动，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民族危机。

对右翼集团，也就是顽固势力，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为他们不同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汪精卫集团已经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了汉奸卖国贼，他们只有反动的一面性，只能对其实行打倒和消灭的政策。蒋介石集团还会有两面性，对之必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对其不愿根本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实行联合政策，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总之，在斗争中既不能破裂统一战线，又要促进合作抗日，这就要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斗争的艺术。毛泽东为此制定了斗争的三项指导原则：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

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对他人之进攻不予还击，要做到后发制人，不先开第一枪。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理”。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可以争取广大群众，还可以促进对方内部发生分化与瓦解，一部分不愿意搞磨擦的分子至少会对斗争表示不坚决，这对斗争的胜负有很大关系。

胜利的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为达此目的，必须注意两条，一是要有充分准备，决不可进行无计划准备无把握的斗

争；二是要善于利用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顽固派中有不同的集团与阶层，从与帝国主义各国的关系上看，除亲日派外，还有特务派、别动派、政训派、军官派；特务派内部又存在若干不同的派系。这些派别在政治立场上是互有矛盾，互相斗争，互相渗透的。他们虽还没有公开反对抗日，但要求抗日的程度，却因其地位、利益和关系的不同而有若干差别。他们都主张反共、限共、溶共，但在反共的程度上也因其地位、利益和关系的不同而有若干差别。这种差别即使很微小，也应当利用。我们要在仔细研究这些对象的基础上，选择当时当地最反动者作为斗争的目标，对其余的则采取中立、麻痹、妥协、拉拢的办法，从而使最反动者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利。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树敌少，易于得到多数的同情，保证斗争的胜利。

休战的原则，即在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之后，只要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我们就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双方实行休战，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订立和平协定，共同抗日，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无止境地斗下去。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有节。

坚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可以限制顽固派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使顽固派陷于孤立。这样，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过去那样的大内战也将有可能避免。中国共产党正是巧妙成功地运用三原则，才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邃见

解，以及所提出的一整套策略方针，对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克服民族危机，胜利地指导抗日战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二）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之间的复杂斗争，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尖锐的反映。一部分共产党员产生了右的错误倾向，如在政权问题上，有人主张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反对实行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在群众救亡运动工作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退缩让步；个别地区红军改编时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过分相信国民党，因而倾向于把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军队中个别人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和严格接受党的领导；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党内出现的这股倾向，根据党内斗争的经验，揭示了一条重要的客观规律：在统一战线形成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在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因为，在统一战线破裂并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一部分党员往往不区分资产阶级的在朝派和在野派，不区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看不见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因而只讲斗争，否认联合，出现“左”倾错误。而在和国民党合作时，他们又往往只看到团结的一面，忽视了斗争的一面，所以右倾就成为主要危险。而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是援助右翼集团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投降主

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①这一重要命题，透彻地阐明了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更明确了在党内克服阶级投降主义的重要性。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②这是抗战成败的关键问题。

为了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去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人民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党已经取得的阵地；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新的阵地，实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可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也反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把抗战初期的右倾倾向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形成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其实，法共的这个经验并不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成功经验，更何况中国还有自己的实际情况。王明到达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他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性口号。他的具体主张是：在政权问题上，应以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方面的重大措施必须经过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批准，否则不应该有所行动。他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极为不满，竟发电无理指责中央，认为采取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在军队问题上，应实行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在群众工作上，应做到“合法”、“统一”。他批评洛川会议没有强调发动群众必须经过统一战线这个环节，他要求一切组织采取合法方式工作。具体来说：“在工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①他要求这些群众团体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他积极帮助国民党政府出主意，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来组织领导民众，把群众运动完全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1938年7月1日，蒋介石指使陈诚宣布实行“武汉民众团体登记”，要一切团体都受国民党领导，否则一律取缔解散，不得有所活动，企图借“合并”与“统一”之名，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团体统统解散。王明却同意将武汉地区受我党领导的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

^① 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

众基础的青年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等，依国民党之“法”前去登记。结果，蒋介石、陈诚指令解散这三个团体，王明竟然同意解散，并将这些团体中一部分干部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非常清楚，尽管王明赞成抗战，坚持国共合作，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这些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加之其有系统的理论，并称这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曾迷惑过一些人，并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危害，如不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党的战略部署将难以顺利贯彻，党领导的抗战事业将受到挫折。为此，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说得好，中国当时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必然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国民党既不承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不准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① 我们不能生硬搬用法共的“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口号，在我国的情况下，我们的正确原则只能是既不要破裂统一战线，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540页。

毛泽东击中要害地指出了王明的一套错误主张是来自于他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复杂异常。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是抗日战争时期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制定政策策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根本指导思想的分歧所在。毛泽东专门从理论上给予深刻的阐述。他明确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满足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①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重要理论，其主要内涵是：

第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民族斗争中包含有阶级斗争的内容。在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两项基本内容，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靠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支柱。革命在反帝或在反封建任何一方面取得胜利，都有助于另一方面同时取得胜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如果战胜了帝国主义，那么，也就保证他们对于封建地主斗争的胜利。反之，他们如果在全国战胜了封建地主，取得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也就保证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也因之而不同。例如，十年内战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情况下，党就要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在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同时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为主的前提下，党就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要口号，同时在不妨碍民族斗争的前提下清除封建势力。这时，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而民族斗争中又含有阶级斗争的内容。

第二，在民族斗争为主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必须有利于民族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满足抗日的需要为出发点，应以不破裂国共合作、不破裂统一战线为条件。以前我党采取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方式，以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现在则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以前我党采取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现在则采用减租减息的政策。所有这些体现了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这是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否则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就会犯“左”的错误。同时，由于各阶级的阶级地位不同，政治经济要求不同，各自的主张、方针、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正是为了调节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以便更好地进行民族斗争。如我党领导工农群众为争取民主、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愈是迅速有效地进行，就愈能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愈能发挥工农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去阻止与压制这种斗争，就会失去工农群众对统一战线的拥护与热情，就会失去抗战的基本力量，因而也就没有能力去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危险，就会犯右的错误。所以，在抗日民族斗争中，我们的原则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要掌握阶

级斗争的分寸。既要硬，但是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又要软，但是不软到丧失自己的立场。

第三，必须把民族斗争引向阶级斗争胜利的结局。由于各阶级的立场不同，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一个是人民胜利的前途，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这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贯穿于抗战始终。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救国论，是要把抗战胜利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胜利的结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论，是要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结合起来，通过民族斗争，不仅要取得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而且要把人民充分发动起来，造成人民最后胜利的结局。因此，我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提出了政权问题。在洛川会议上，党提出了独立的政治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改造大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军队的任务，以后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任务。这些都是为了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结局所采取的重大步骤。这表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既要坚持合作，又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要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又要照顾阶级的一定政治经济要求。“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①

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待让步的态度是：不拒绝让步。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可以向同盟者让步，而且在一定时候还可以向敌人让步。不承认革命道路上的曲折，反对任何让步，那是书生的看法。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曾经批评法国布朗基分子所谓“不做任何妥协”的声明是一句“胡吹的空谈”，“是可笑的”。列宁也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

^①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

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非常形象而深刻的比喻：让步是事物曲折发展中的一段，革命好比一条河，让步是个弯子（如黄河九道弯）。但革命总是向前的，正如河流一样，曲折不能阻挡总的前进方向。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红色政权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暂时停止等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大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损害革命的根本利益为原则的，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不能取消或降低，党的领导权不能放弃，党已经取得的阵地不能放弃。这种让步又是对等的、相互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有让步，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有让步。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地主要减租减息等等。让步是为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是把它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来看的，是把它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一环来看的，是为了将整个革命运动推向前进，这正是列宁主义的让步。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者只看到民族斗争，看不到甚至否定阶级斗争，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把抗日和民主对立起来，因而只要统一，不要独立；只要合作，不要斗争，一味地退让，以退让讨好蒋介石国民党。这实际上是将统一变成混一，将合作变成投降。王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战争观，正是他放弃党的领导权、犯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根源。

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制

定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正确方针，始终不渝地贯彻了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把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行提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高度，认为独立自主原则本质上是个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才争取和确保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第一，通过独立自主地提出我党的纲领路线，以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抗战爆发以后，党对中日战争的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向全国人民指出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指出抗战必胜的前途以及夺取胜利的方针路线。党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十大纲领，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并制定了实现三大政治口号的具体政策。抗战即将胜利时，党中央发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政治领导——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指引下前进，并坚定地站在我党这一边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通过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以逐步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利用一切可能发展进步势力，影响和争取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还争取了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我党提出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符合中间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拥护，因而能够引导他们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争取民主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争取了广大民主人

士站在我们一边。在敌后，我党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不靠他们委任，不靠他们发饷，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团体，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运动；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人民军队；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为此，我们采取灵活的策略方针，有些事应该得到国民党同意后才去做。有些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就“先斩后奏”。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冲破国民党的束缚而由我党建立的第一模范抗日根据地。我们先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然后再向蒋介石、阎锡山发出通电，宣告边区政府的成立。蒋、阎虽对此不满，但也有口难言，因为我们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复国土而建立的民主政权，光明正大这正是我党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范例。有些事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我们做了不告诉它，就“斩而不奏”。有些事做了要妨碍大局，我们先不做，就“不斩不奏”。

坚持上述几点，我们就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政权，也就有可能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我们党的领导就是随着人民力量的日益壮大而逐步加强和巩固的。

第三，通过不断批评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和反共活动，迫使顽固派在某些问题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我们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是“洗脸”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和反共活动，要给予坚决的打击，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要给予坚决的反击。以此来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这样才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的地位。抗战中，我们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由逼到联，由联到逼，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迫使他们在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不得不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如在要不要抗战

的问题上，蒋介石实际上接受了我们的领导，他要妥协，并在暗中共同日本侵略者谈判，但始终不敢妥协；他要反共，甚至发动反共高潮，但又不敢彻底反，硬是被我们拖住了。

由此可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践和坚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总结党的这一段历史经验时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8页。

第四章 殖民地半殖民地 革命理论的新发展

一、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理论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浪潮甚嚣尘上，英美等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面对国内国际这样一股逆流，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许多中国人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实事中指明正确的道路。”^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指导抗日战争的进行，继续探求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没有改变这个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因此，抗日战争依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依然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① 在广大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为了使中国革命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下去，毛泽东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使毛泽东政治思想更加系统化和完整化。

毛泽东政治理论始终坚持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统一的思想，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忽视民主革命，而且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关系。“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②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③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统一，革命理论和建国理论相结合，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显著特色。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首先，在严酷战争条件下，毛泽东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

只有把民主革命理论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这个理论才有根基。中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之强大和残酷，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力量之不平衡和关系之犬牙交错，都是罕见的。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客体——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的精辟见解，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他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 and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①此后，他又于1940年1月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毛泽东依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做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的科学论断。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完成第一步的革命任务，其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

毛泽东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划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两个阶段的标志，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日趋腐朽，更加残酷地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却愿意扶助或声援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

运动，因此，在该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发生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革命，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这种变化，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现在和未来，结局和前途，影响着世界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增强人民战胜世界法西斯的信心，同苏联等国家结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无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内部条件，尤其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好。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表面上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但搞孤军奋战，不知道无产阶级只有联合一切革命阶级，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开辟了正确认识并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壮大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同时由于无产阶级自身阶级及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它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富有组织纪律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正是由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变化，使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较前有根本性质的不同，革命更加彻底，并为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领导阶级的变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领导，便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特征。

第三，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从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联系上，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得出了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的科学结论。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建立一个过渡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中国是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化的垄断经济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封建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矛盾是基本的经济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人民的解放，是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这种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由于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它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是用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在经济上，是建立以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

因此，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充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必要的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因素必然迅速发展，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增长；在经济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将不断增长；加之国际环境的有利，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而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即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

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是过渡的形式，但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由于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这种理论就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避免了超越客观条件，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

其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理论概括，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毛泽东不仅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概念，而且完整地表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

这条路线，明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和任务、革命的性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指出，决定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么，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二者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但二者的力量是不平衡的，有主次之分，其中，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但帝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由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地损害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特别是南中国被日本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领后，英美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地的绝大多数利益和中国的政治、军事战略位置被日本所囊括，这是英美等帝国主义所不甘心的，同时，日本想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因此，毛泽东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根基是地主阶级。在抗日战争中，那些背叛民族利益，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都是革命的对象。

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么，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这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民族革命，对内推翻封建地主的压迫，进行民主革命，而尤为主要的是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获得民族独立。这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向前发展的根本要求。不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获得独立，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在中国，这两大革命的完成是关联的。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它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和剥削人民。因此，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反之，如果不武装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不领导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错误的。

关于革命的性质。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而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弄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并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的，则是毛泽东。他根据对中国革命

对象和任务的分析做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结论（此前已有详细分析）。

关于革命的动力。判定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分清哪些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由该阶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确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抗日战争时期各阶级的变化，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毛泽东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制定了争取中间势力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的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分析尚不完备，明确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则是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毛泽东说，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直到1940年3月才看出来。这就是说，在当时，毛泽东认为，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还不是一回事，因而没有将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的一面做了分量较重的评论。经过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

做了区别，把大资产阶级明确地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分出来，并将其纳入于买办阶级，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做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按照毛泽东这个指导思想行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最低限度。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做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

与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相联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中间势力是一个重要问题，即谁能尽可能多地争取中间势力，谁就能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深化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关于中间势力的分析又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毛泽东在正确区分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基础上，相应地制定了对这两个部分的政策。在明确中间势力的范围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进一步扩大了。

正是由于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毛泽东进而正确阐明了它们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同作用。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这是由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

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组织纪律性、革命的彻底性等优点所决定的。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农民是分为不同阶层的，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富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带有半封建性，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区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面性的阶级，这就决定了它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的革命，它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最后，具体规划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即国体问题）以及如何组织和管理该共和国（即政体问题），毛泽东对此都做了具体的论述。他指出，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上不外乎这三种：①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②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③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接着，毛泽东对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做了阐明，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即是说，这个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国体需要相应的政体来体现，政体必须同国体相适应，并为其服务。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实行这样的国体，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作用，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反对敌人。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民族压迫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党领导的任何斗争是为反抗外族入侵这一神圣任务服务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① 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必须服务于抗日这个最大的政治。经济建设是搞好政治建设，取得抗战胜利的物质后盾。就整个民主革命而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 第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一环。因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但这个目的的实现，要根据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毛泽东指出，“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1061页。

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到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①之所以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是因为抗日的需要。这样做了，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抗日服务。党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②“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③

由此可见，基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脱胎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6—7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101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

建经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成分，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随着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

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①

依据一定的文化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和能动的革命反映论观点，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首先，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一定文化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所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后，其政治和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所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自从中国有了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有了它的土壤，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有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把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牢固地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这就为人们树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695页。

其次，毛泽东深入探讨并科学回答了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政治不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也是思想文化的集中表现。政治对文化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表现于，其一，一定的政治直接决定一定的文化性质。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又不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因为领导阶级和革命的内容不同。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在“五四”以后，领导权就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同时，由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文化革命，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其二，政治革命决定着文化革命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政治革命的历史特点相适应，文化革命是随着政治革命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

再次，毛泽东科学地规定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深刻地论证了一定的文化对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作用。

毛泽东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他得出了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形态的政治和经济的结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②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③

毛泽东提出的一定条件下文化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贯彻了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在承认文化产生的唯物主义前提之下，对文化的反作用做出了量的规定。它说明事物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凝固不变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事物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这个观点的科学性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文化革命无疑是政治革命的先导，知识分子起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本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已逐步壮大起来。但工人阶级要想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就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而开展起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行了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革命。正是这场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革命，指引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胜利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着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反映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关系的观点，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最后，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的，带有自己民族特性的文化，应当如何对待外国的文化，毛泽东对此做了科学的回答，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①“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②只有“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③才能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同时又包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发扬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大中国封建社会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时，应当“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其三，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就把文化和人民群众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我们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

毛泽东最后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规定了民主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构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并存，强调要适当发展不操纵国民生计的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124

人资本主义经济，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条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观点，规定了文化革命的内容和发展方向。这样，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描绘了一幅壮丽的蓝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二、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中国革命是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战胜敌人的，这条道路是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被提到战略地位，建立根据地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抗日根据地是长期抗战、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可是，当我们在敌后已经把群众游击战争广泛发展起来，已经建立起来强大的抗日武装，具备条件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把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还是不能达到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可以说，抗日民主政权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也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时，党面临的是和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错的复杂的环境中，我们的民主政权，属于什么性质，应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进行哪些方面的建设，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党创造性地予以解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民主政权建设，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主动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民主政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指示说：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 $\frac{1}{3}$ ，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 $\frac{1}{3}$ ，中间派占 $\frac{1}{3}$ 。并明确了政权的性质“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①

三三制政权的形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形式不好，内容再好也难于圆满地贯彻。这就要求我们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使之既能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阻碍地充分发扬出来，又不致让作为中间分子的地主资本家难于忍受；既能充分反映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又能反映地主资本家的合理要求与利益；既能密切联系广大工农群众，又能集合适当数量的地主资本家阶级的代表。而三三制正是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毛泽东就明确说过：“共产党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②

首先，三三制政权是集中和发挥各抗日阶级的力量，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恰当的政权形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② 《毛泽东同志对延安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经验总结的提示》。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政治，坚持一党专政，并玩弄假宪政真独裁的骗局，人民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连言论出版集会甚至抗战建国的自由也都被剥夺，爱国分子横遭捕杀，进步文化均被摧毁，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造成抗日战争的危机。三三制政权的提出，表明我党领导的政权完全是从抗战大局出发、团结全体抗日人民进行民族斗争的抗日民主政权，它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的对照。三三制政权真正能吸收各阶级各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发挥他们的力量，清洗那些在机关中部分脱离群众，不堪胜任的分子，更加提高政府的威信及行政效率，更加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及抗战热忱。这样的政权才能战胜日寇、亲日派、反共顽固派的任何进攻，坚持抗战。同时也给全国统一战线树立一个榜样，对于推动全国的民主化，促进全国的新民主主义的实现，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三三制政权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的有力保障。

政府的各项政策诸如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问题，以及战争的人力物力、民主实施问题等政策的贯彻，如果没有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则将失去保障以至于完全不可能付诸实施，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其三，三三制政权能更好地争取中间阶级，纠正政权工作中的错误倾向。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点在抗战初期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党打退以后，党内“左”的倾向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有的同志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新的

“马日事变”，对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发生怀疑，认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即将破裂，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需要改变。“左”的倾向反映在政权问题上，就是不执行各抗日阶级联合政权的统一战线原则，尤其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把中间分子看成顽固分子，要求中间分子有如同进步分子一样的表现，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党外干部不信任，甚至不愿接近他们。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如不及时克服，必然要妨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继续贯彻，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巩固。为此，毛泽东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给中间派以 $\frac{1}{3}$ 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①中间分子参加抗日民主政权有利于照顾中间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同时，对于争取全国的中间势力，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四，三三制是共产党为自己制定的一个约束机制。

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处于领导地位，这种地位很容易使党内发生把持包办的现象，使中间分子、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生畏，这样就搞不好工作。正如谢觉哉所说：“有枪的一句话不谨慎，可以使人家一晚睡不着觉，而勉强使人家服自己，常常使人气破肚子。”^②因此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 $\frac{1}{3}$ 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团结广大党外人士，有利于当政党本身。

所以，三三制是适合抗日时期中国国情的、集中一切权力的高度民主机关。它不仅是符合全体抗日人民利益和最能发挥全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②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人民抗日积极性的政权形式，还将锻炼我们党员和党的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带路人。

（二）实行民主选举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这正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权的特点。

选举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大问题，没有选举，民主政治便无法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十分重视选举。1871年3月22日《公社报》写道：“选举制应当适用于一切社会职务，这个原则是民主的灵魂，共和的实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部政权组织，包括民意机关的边区各级参议会，行政机关的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这种选举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实现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

当时，除汉奸卖国贼，被判罪剥夺了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选举的人员是很普遍的。如陕甘宁边区，先后于1938年、1941年和1945年进行过三次普选。第一届参议会选举，全边区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第二次参议会选举时，80%选民参加了投票；第三次选举时，参加投票的选民增至82.5%，有些县竟达90%以上。在投票方式上，采用选民所能接受的各种选举办法。识字的人采用票选法，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票法，编号选票法，因故不能赴会参加选举的人，则采用背票箱挨户送票收票法。这些因时因地，因人民的文化程度、

习惯而随时发明、灵活运用的方法，保证了绝大多数选民直接参加了选举。选举完全是平等的，没有财产、文化、民族等限制。如陕甘宁边区 170 名参议员中，有工人 6 人，贫农 18 人，中农 69 人，富农 26 人，商人 9 人，地主 34 人，其他 8 人。其中回族 3 人，蒙古族 2 人，妇女 7 人。这反映了边区内部在社会关系上各阶层是完全平等的，民族关系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完全平等的。选举又是完全自由的，谁要选谁就选谁，谁也不能控制谁。人民对选举什么人非常关心和慎重，讨论候选人名单时，群众尤其重视候选人对抗战是否积极，办事是否公正。一些因工作消极，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人，均遭到群众的反对而落选。不仅如此，选民还有参加竞选的自由。1941 年 9 月 29 日，延安市南区为了选举边区和市参议员，召开了选民大会，15 位候选人出席，选民十分踊跃，高达 2000 多人。会场情绪高昂，气氛活跃。竞选开始后，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提出自己的施政主张。候选人马小云最后发表竞选讲话说：“请你们对我做一个估计吧！如不相信，请把票投给别人，如相信，请投马小云的票。”选举结果，4 人当选，马小云以最高票当选。

第二，真正贯彻了“三三制”原则。

共产党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并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提出候选人，为他们竞选。共产党员当选超过三分之一，就主动退出。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时，原定政府设委员 18 人，按三三制原则应选出共产党员 6 人，结果多选了一人。于是，闻名全国的徐老（特立）请求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依次补上。1941 年以后，政府行政工作人员按三三制政策进行调整，边区政府副主席、教育厅正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等都由党外人士担任。这些至诚的行动，使党外人士大为感动。边区参议员、八旬老人

李丹生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以偌大年纪，不远百里而来，而且现在为什么又来充当参议员呢？那就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是诚心诚意，古称唯德动天，至诚感神，而况于人乎？”^①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国内外还有个别分子说过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我想要找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内外独裁主义者那里去找，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联合政府。”^② 又如晋察冀边区 1943 年 1 月第一届参议会根据三三制原则，采用平等的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参议会常驻委员和政府委员。政府委员共 9 人，其中就有国民党负责人 2 人。在边区行政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中，国民党员占 3/10，共产党员则仅占 1/10。选举后，一位经历过民国以来国会和地方议会选举的年老参议员感慨地说：这是我数十年来阅历人间，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民主的选举，一切都无可非议，真正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那些被选出的人都是德才两全的人物，一定不会辜负边区人民的寄托与期望。这次选举完全证明了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三制，实出于一片真诚。你看那选举的结果，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无党派的中间人物……这真是言行一致，本人十二万分的钦佩！^③

第三，在选举中检查政府的工作。

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是搞好选举的关键。检查政府的工作，也就是人民对政府和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毛泽东曾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① 《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28 日。

②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

③ 肖斯：《记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要搞好检查工作，首先政府要认真做工作报告，并在报告中进行自我批评。刘少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一、老老实实的政治工作报告，不要带一点宣传色彩；二、勤务员向主人报告的态度。各地边区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在选举中，人民放手检查政府工作，揭发了大量有关兴利除弊的实际问题，大部分获得了解决。如延安、鹿县、延川、志丹等地，在1945年选举中发现了2万多个问题，能解决的都随时给予解决，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检查过程中，不仅发现了问题，同时还识别了干部，自由选择 and 认真讨论了候选人，自由选举了为人民信任的各级代表。正如老百姓所说：这种选举是头瓜里选头瓜，好人里挑好人。经过选举活动，人民的自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各级干部的上进心、自信心和工作积极性也更加提高了。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

（三）共产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权发展与巩固的保证

三三制政权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以后，能否得到不断发展与巩固，能否发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作用，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特别是在三三制政权中有 $\frac{2}{3}$ 的党外人士参加的新情况下，有些人就提出了共产党是否还能起领导作用的问题，毫无疑义，这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 $\frac{1}{3}$ 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

^① 转引自黄炎培：《从延安归来》。

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 这就是说，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不是以党员数量和强制的办法，而是以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保证党的领导权。谢觉哉对领导权问题就做过深刻的阐释：“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党员很积极，有信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自然党不应放弃带路的领导，但必须是三三制才能显得出党的领导。”^② 为什么必须是三三制才能显得出党的领导呢？任何一个党派，如果它相信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那它就必然要在民意机关中、政府机关中，以至整个人民大众中，争取别人来拥护自己的政策，这就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共产党员在行政机构与民意机关中。只占全部人数 $\frac{1}{3}$ ，非党人士占 $\frac{2}{3}$ ，党外人士一多，大家都敢讲话，就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或者根本就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是同意我们的主张而不赞同我们的办法，或者同意主张办法，而反对我们提出来的人选。在这种情形下，被选到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里去的共产党员，就不能不细心地、深入地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吸收人家正确的意见，通过互相讨论、研究，使党的政策更加符合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更为各阶层人所拥护，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② 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而有利于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才是真正的领导。

同时，由于党外人士的积极参政，共产党员就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马马虎虎、吊儿郎当地工作；就不能再自高自大，目无旁人。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否则就会被孤立，受到群众的批评和指责。显然，三三制是彻底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培养和提高共产党员组织观念、群众观念、民主作风的有力措施。

再者，党与政在工作上明确分工，比较适合于民主制度的体制；各自独立工作的建立，也才能更泼辣、更有生气地实现对广大人民的领导。在没有实行三三制以前，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占绝大多数，极容易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主张和办法。而政权机关也就不能不建立各自的独立工作。党政分工，能更有效地实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

因此，党的三三制政权政策不是在减轻与放弃党的领导责任，相反，由于政治领导方式的确立和巩固，政治领导能力的锻炼和加强，必然会加强党的领导责任，保证党的领导作用。

党如何实现对党外人士的领导呢？一般地说， $\frac{1}{3}$ 的左派进步分子容易接受党的领导，主要是 $\frac{1}{3}$ 的中间分子，由于阶级利益和历史关系，他们和党存在一定距离，加之敌人挑拨离间，对这部分人的争取和团结，更增加了他们在受党的领导时的思想疑虑，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对待，审慎地工作。

政治上，要坚决贯彻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的政治基础，即《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施政纲领。

组织上，要坚决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务必使党外人士感到不是来作客，而是和我们一道做主人，有职有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要给党外人士以适当的职务。参议员和政府委

员中能够工作的，要尽量吸收他们参加适当的工作。除此，还要尽可能照顾到“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有适当条件的可以任副科长、科长、副区长、区长以至副县长。为了在实际中培养一批非党干部，财政上多开支一点，也值得。其次，要尊重党外人员的职权，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们去做，同时帮助他们完成任务，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责任心。有成绩，记功表扬；有缺点，帮助改正。总之，不可遇事包办，要积极帮助他们。陕甘宁边区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很有成效，毛泽东曾表扬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很好。边区在开始实行三三制时，把中间人士的代表人物李鼎铭副主席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他有职无权，因此他在会议上很少发言，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总答复：“俺没意见。”为此，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即李维汉）找他谈心，才了解到症结所在是他的职权没有受到尊重。李鼎铭坦率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执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①为解决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边区政府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专门做出两条规定：一条是每周举行一次向主席、副主席的汇报会议，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也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再一条是，各厅、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心情舒畅了，不做客人，而以主人的态度出现了，不讲“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他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当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时，一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笑着回答：“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又如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本来比较右，后来也能站在边区立场，为边区说话了。

作风上，必须有真正的民主作风。毛泽东在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过：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别人对的，虚心采取，自己不对的，马上改进，追求真理，没有党见，使党外人士真正感到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应当看到，党外人士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对待具体复杂的实际政策，不会完全一致，不会完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处理不同意见时，要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同具体问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施政纲领和总的政策之下，对于个别问题，还有争论，甚至有时遇有原则性的分歧时，我们得有适当让步。例如在租佃问题上，土地纠纷的个别案情上，个别干部的处理上，都曾有过适当让步。陕甘宁边区的绥德警备区有些县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事件，边区政

府专门组织一个由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任正副主任的审判委员会来仲裁这些案件。有些案件裁决结果，也有农民吃亏的。毛泽东认为，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合作，有些事情让点步也是难免的。农民吃了亏，可由边区政府给农民做相应的补偿，使农民不吃亏，这样，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照顾到了。

但是，对于原则问题要做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决不能迁就。如国民党作风的侵入不能不加以阻止，对土地问题不能偏听地主士绅们的一面之辞，对保安机关应否存在的意见不能让步等等。不过，批评和斗争时，应该区别是非轻重，照顾不同的人和区分不同的事实。批评的方式和场合要审慎。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特别爱惜自己的面子，应该避免当众批评和当场批评，而多用个别谈话方式，婉转说服的方式，并要以诚恳帮助的态度，一面批评错误促其改正，一面顾全面子，使之感激。陕甘宁边区一参议员，头年减租时，明减暗不减，次年被政府发现，他勉强减下来，但又令其子出面抽回某佃户土地，佃户拒绝退佃，在耕牛农具被打坏后告到县政府，县府将其子押在看守所，同时，请来参议员本人向他说明减租减息是边区参议会的决议，是老先生参加通过的，现在令郎犯了法，老先生是上司，请指示如何处理。他无法支吾或分辩，当场认错，答应赔偿佃户损失，将儿子领回去教训。一场严正斗争，以和平形式解决了问题，既教育了这位参议员，又保存了他的面子。以后他的态度转变得较好。事后，中间人士反映强烈，说：这方式好，人谁不爱惜面子，人家做了亏心事，咱就给他个面子，一辈子感激。

关于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与物质待遇问题，不能要求他们与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生活上给予照顾，私生活上的自由，只要不十分妨害政府的工作，政府一概

不加以干涉。如李鼎铭最初住在山沟里的一个土窑洞里（防空），进出不便。以后为他新砌了石窑洞，这是陕北的“钢筋混凝土大厦”，他非常高兴。李鼎铭有些特殊的生活爱好，我们不加干涉，对此他是很感激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一再强调三三制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共产党员要学习政治家的风度，克服狭隘的观点，去认真贯彻。各根据地坚决贯彻了党中央指示，对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中的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做了争取团结工作，又做了必要的斗争，并予以诚恳的帮助和适当的生活照顾，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权，使三三制政权发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作用，使人民充分享受民主权利，也极大地激发了党外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情。党的三三制政权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

（四）民主政权建设的立足点应放在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上

民主政权建设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经济建设是民主政权建设的物质基础，政权建设的立足点应放在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上。

政权建设的好坏是看它能否促进经济建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月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为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发展经济成为迫切的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也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去保障财政的供给，保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抗日经济的供给，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毛泽东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他深刻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

首先，毛泽东强调从发展生产上寻找根本的出路，号召全体军民下决心自己动手，用自己的生产活动来渡过困难。于是解放区在军队、机关、学校中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随后又开展了群众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不分职务高低，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参加生产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也抽出时间在住地杨家岭窑洞下面开了一块菜地。朱德和战士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种植了菠菜、白菜、南瓜、黄瓜等蔬菜。周恩来、任弼时都是纺线能手。中央书记处的领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各位副主席、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参加劳动的行动，极大地鼓励了各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的信心，极大地推动了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同时，党的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参加劳动，对当时的精兵简政，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收到了比预想要好得多的效果。到1942年，边区的耕地从1938年的8994483亩，增加到12486937亩；1943年又开了100万亩荒地。到1945年耕地面积扩大到15205553亩。植棉从1937年几乎不种植到1945年扩大为35万亩。牲畜也大量增加，达到

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有些部队通过大生产运动达到了完全自给，其中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开荒成绩最为突出，仅1943年就开荒地达10万亩，1944年部队种植谷物83万亩，产粮9万余担，做到了丰衣足食，耕二余一，使荆棘丛生、渺无人烟的南泥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此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解放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收到了巨大成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大生产运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可以说，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克服对财政困难的最有效办法，也是加强干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进行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

其次，制订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为保证经济总方针的实现，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毛泽东还提出了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深刻

而形象地说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他认为，精兵简政是厉行节约的最好办法，通过精兵简政，一则可以节约大量行政费用，解决经济困难；二则通过建立高效政府，以更好地指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同时，当时的上层建筑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存在着许多弊端。一是严重地存在着头重脚轻的现象。在上级，人数过多，机关庞大；在下级，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差；上级人数过多，就有人浮于事的现象；下级干部配备得不强，一切命令和指示，总是多少要被打点折扣，以致有许多很好的政策，在有些地方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二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制度还没有完全正规化，还始终多少存在着“老一套”的游击作风。毛泽东用气候变化了，穿衣也要随着变化和黔驴之技两个例子，说明庞大的政府机构必须裁减。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之交”时，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毛病来。目前根据地的情况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地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他又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非常清楚，精兵简政是抗击日寇的“三光”政策和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克服“鱼大水小”矛盾的重要办法，也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创造条件。

精兵简政政策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

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他在提案中称：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一议案，并在批语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倡议，并把它推广到各个解放区。中共中央在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中指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取得了显著成绩，达到了预期目的。首先是紧缩了开支，节约了民力，顺利地度过了难关。一般地说，根据地内脱离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当地人民总数的3%，而实际情况是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陕甘宁边区自1941年以来，每100人要养活4个脱离生产人员。精简以后，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减了 $\frac{1}{4}$ ，边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八、九个减至四、五个。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等6个单位，精简40%强。消除了头重脚轻的积弊，直接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1942年为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2万石。太行根据地政府人员减少一半，1944年的公粮较1941年几乎减少了一半。其次是减少了脱离生产人员，加强了生产第一线。由于减去不必要的政务，可以全力搞好生产，突出农业第一的方针。据估计，边区30万个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勤务工作的时间，每年约为20万人的一月时间，它可能生产出10到12万石的粮食。精兵简政后，民力动员减少了。过去延安一年要动员6万多个，精简后只动员2.8万多个，减少一半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自力更生，自运粮草，不再动员民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1943年成为生产大发展的一年。兵精政简，建立

起高效、灵活、统一的政府，使我们更有力量，更能适应战争情况。所以精兵简政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抗日民主政权正是紧紧抓住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这个重要环节，才为巩固根据地，度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生产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民主政权还进行了文化建设。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并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和政策。使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地方。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建设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民主政权领导着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其中心目标是为了前线，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的。

（五）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首先，抗日民主政权的成功建设，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这样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①在敌人占领我小半甚至大半国土的情况下，我游击队要做与总后方隔绝的无后方作战，必须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才能使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有了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强大根据地，就有了敌后抗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有了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的源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有了根据地人民组成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有了坚持长期战争的坚强堡垒。

有了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强大根据地，确保敌人后方的人力财力以及一切物质资源不为敌人利用，粉碎敌人的“以战养战”，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的计划，抑制敌人进攻和“扫荡”敌后的大量兵力，才能使敌人无法向全国无限度地进攻，才能有全国抗战的相持局面。如1942年敌人计划在华北征粮2000万石，结果所得不到其中的1/10，“兵站基地”的一切计划都无法实现。

有了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强大根据地，并使之不断发展和联成一片，就可以缩小敌人的占领区，扩大我们的占领区，钳制敌人，消耗敌人，最后达到反攻敌人的目的。周恩来说得很清楚：“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20个根据地，我们便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每天平均能消耗敌人10个，则全国100个这样游击队便可以消耗敌人1000，一年便可消耗敌人三四十万。敌人最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怕损失。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以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事了。”^①正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我党建立起约100万平方公里面积一亿多人口的19块根据地，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江、广东、琼崖、湘鄂、鄂豫皖、河南等遍及华北、华中及华南的广大解放区。这些根据地对整个抗日战争

^① 《群众》第3卷，第22期。

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到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4%，抗击伪军的95%，拖住了敌人3/5以上的侵华兵力，使敌人陷于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仅完全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企图，而且准备了将来配合正面反攻的力量，成为将来反攻阶段的前进阵地。所以，抗日根据地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成为中国能够长期抗战、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成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其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与主要交通线，而以这些城市和交通线包围着我们，我们则占领乡村和一些小城市，而以这些乡村和小城市包围着敌人。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王明，此时又对这条道路提出怀疑并发生动摇，他轻视游击战争，轻视敌后民主政权的建立，把工作重心放在大城市，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在民族战争条件下，乡村能否战胜城市这一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对此做了透彻的论述和回答：“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中国则不同，中国存在“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了一部分地方，还有一部分地方。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之我坚强抵抗，就迫使其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不但给了我们一个总的

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敌后地区，敌也无法全占，广大乡村仍然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使我们有了广大游击活动的地盘。第三是今日的条件。今天中国进步了，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在敌后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民主政权，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条件，也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根据。^①毛泽东运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来证明乡村包围城市的可能性：“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的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②

毛泽东的回答和预见是极其正确的，抗日战争中广大民主政权的建立，表明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在相当广大的土地上成为伟大的现实，比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大大前进了。抗日战争时期真正形成了乡村对城市的包围，这不仅出乎敌人的意料，同时也为全国许多人最初所意想不到。在华北许多重要城市相继失守、敌军沿铁路公路长驱直入的时候，国民党的各级行政官吏弃职潜逃，秩序混乱，华北广大地区已变成敌人的后方，敌人任意烧杀淫掠，汉奸到处猖獗横行，广大居民处于彷徨、恐怖、悲观失望之中。此时很少人能想到敌后还可以坚持抗战，能想到敌后还可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能想到敌据城市，我据乡村，乡村还能够最后战胜城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又

① ②毛泽东：《论新阶段》。

一次精辟地阐述和发展了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民族战争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继续，实现由一个个民主政权的建立至全中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圆满地解决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问题，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问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英勇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仍然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再次，抗日民主政权是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试点，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型。

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实行“总力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进攻。因此，抗日民主政权领导着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领导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担负着多方面的任务；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保障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改造教育事业，进行文化宣传，等等。通过这些工作，为巩固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尔后新中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广泛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政权建设起着未来新中国的雏型作用。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在摧毁伪政权收复失地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新式抗日民主政权，它较之陕甘宁边区与在后方的环境要困难得多，所以敌后群众反日斗争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经验来得更加可贵。同时，敌后地区情况各异，发展不平衡，因而工作与组织要采取许多具体的不同办法。敌后地区包括我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及敌我经常争夺的游击区三种不同地区。

而我根据地与游击区，又有山地根据地，平原根据地，我占优势游击区（根据地周围），敌占优势游击区（普通点线区域）的区别。就是在我占区又可分进步力量占优势，或顽固力量占优势，或两种力量相平衡等三种不同情形。我们的一切政策和工作要从具体情况出发。

敌后民主政权就是在这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建立起的，而且使根据地成为“天罗地网的根据地”，“铜墙铁壁的根据地”，“自足自给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是极为丰富和全面的。

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①

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我们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权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试点。“三三制”是联合政府的一种形式，实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形式。建国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那么，“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的实践，无疑为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完全可以说，抗日民主政权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雏型，并为日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完整提出和成功实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5页。

三、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造性贡献

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决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形成民族统一战线以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党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政治上、思想上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正体现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从而才能担负起对抗战——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领导责任，才能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18年建党经验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党首先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建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又一创造性发展。

1935年之前，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过程中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蹒跚学步阶段，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学说，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党的建设的自觉性，初步认识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新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是，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以至在整个对日作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实现坚实的工农联盟，还要与大地主阶级、大官僚买办阶级等这些和自己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集团实现联合，而且这种联合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已

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①是“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②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面前，党内部分同志由于对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产生了右的倾向，如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一些共产党员竟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不愿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根据地内，有人主张议会制度；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等等。党内甚至也出现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党内“左”倾错误思想也没有完全被肃清。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发展和壮大自己，才能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实现在统一战线内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已成为摆在我党面前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理论是对实践的解释，是对实践的指导。伟大的实践活动，必将产生出伟大的理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以至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一些错误思想和认识，写了大量著作，如《〈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这些理论不但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使是现在，也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综观之，其中被毛泽东放在首位的，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学说最具有独创性的方面，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一）关于党的政治建设

党必须在政治上建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之根本，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都要围绕着党在政治上的建设来进行。政治上建党是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政治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正确制定党的纲领和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正确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各项方针政策，并用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为，通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使全党步调一致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在政治上建党的基本作用在于确实保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这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党在政治领导上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直接决定着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建设的首要问题；在延安时期，则是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政治领导，去夺取抗战胜利这一重要历史任务的根本保证。

1. 政治上建党的首要问题是正确制定党的纲领。

党的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纲领规定了我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党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教条，而是要依据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具体阶段，从当时的实际和实践出发制定出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政治路线，即最低纲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那么，如何实现党的这一最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纲领，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这一政治路线呢？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创造性地把它当作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规律，它包含着三层含义：

第一，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的许多特点，例如，党必须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矛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的独立性，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党员和干部必须能够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学习战争，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等等。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巩固和发展。建党后的18年，“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巩固和发展，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①“18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②18年的时间，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即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正是围绕着这两点进行的。到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由于我党积极倡导全民族人民团结抗战，终于“西安事变”之后与国民党达成了合作，促使抗日战争得以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更广泛的拥护。1941年1月，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党与之做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共势力的气焰，使抗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护，也使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的时期内同资产阶级联合，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和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必须同它进行坚决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我们党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对它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党也同样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而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地分裂统一战线时，我们的党就会巩固和发展、就会前进，中国革命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这要求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必须制定与之相应的政治路线，并围绕这一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前进一步”；党的政治路线不正确，“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18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18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18年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① 比如，1927年，由于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在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面前措手不及，遭到了重大损失。1930年，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主张全国性武装暴动，坚持城市中心论，又一次使党遭到了重大损失。而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引导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中国革命走入了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因此可以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

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必须与党的建设紧密相关的理论，科学地说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的相互关系和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创造性的原理和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 通过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在政治上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实现党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高度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②

通观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1882年写给爱·伯恩斯坦的信中第一次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③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不断进行的党内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多次强调，对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打倒它”，即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党能够澄清错误认识，沿着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胜利前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3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第一，反对自由主义以纠正党内右倾错误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出现了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思想，而党的不少同志对于这种现象不批评不斗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有一些同志因对党的新政策不理解，就不顾党的组织纪律，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针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毛泽东于1937年写出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指出：自由主义从它的阶级根源上看，其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从思想根源上看，在于“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原则。它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而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政治上、思想上高度统一——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上的党，必须是党内团结——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党，唯此才能完成带领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性的涣散软弱，如果在党内任其发展，结果就会是整个党的涣散，软弱，而软弱涣散的党是绝不能够具有战斗性的，是绝不能够完成领导革命的历史使命的。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这种革命队伍的腐蚀剂，“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去“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①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批判自由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的原则，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提高党的战斗力、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发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7

了巨大作用。

第二，反对主观主义以纠正“左”倾错误思想。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左”倾错误思想一直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影响，给我党带来过重大的损失。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中90%以上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934年前后中共临时中央所奉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使30万红军将士最后仅剩不足3万人，大片革命根据地也被迫放弃。到了延安时期，“左”倾错误思想主要表现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其实质就是主观主义。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和共产党是不能并存的。”它在党内主要有两种表现，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①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前的革命经验问题上，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具体实践，灵活地运用之，不能不顾实际，一味照搬照抄。否则只会给革命带来损失。比如俄共（布）在提高党的纯洁性方面，曾多次采用“清洗”的极端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纯洁党的目的，但同时也使许多持不同意见，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甚至还有党的优秀干部、党员受到了镇压、监禁、流放，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党内民主也受到了压制。而中国共产党基于党内最本质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党内同志之间是与非的矛盾的这种认识，在党内斗争中采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好像医生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就更好地解决了提高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问题。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内纠正“左”倾错误思想，才能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

3. 在政治上建党还必须要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领导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建党这一思想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阶段，实现对战争的领导这一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毛泽东所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在全面分析了抗战形势之后，无可辩驳地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① 要完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必须做到：

“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

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① 也就是说，党要根据革命各个阶段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有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② 也就是说，党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时刻坚定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团结和领导广大群众，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③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统一战线始终应该是，而且也必须是我党所要坚持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纪律的严格性。”^④ 也就是说，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来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抗日。

（二）关于党的思想建设

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在思想上的建设当作首要任务来抓。所谓党在思想上进行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正确地贯彻党的指导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改造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在思想上建党的首要内容是要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①即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②即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广大党员，使之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由于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迫切需要党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党日益成为“全国性的”大党，新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因此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被带进党内，而党内原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又还没有得到彻底肃清。正如毛泽东所述：“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③根据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的这一现实，中国共产党要发展壮大自己，就必须大量吸收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很大成分的，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党，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进到党内来的同时，身上还保留着很多本阶级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

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有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①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应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党的先进性是党员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共产党员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清除自身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在党内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

所谓思想上入党，就是：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实践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在胜利和成绩面前不骄傲自满，在失败和错误面前不悲观动摇。

所谓思想上入党，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实现无产阶级化，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②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由这样思想上入党的人所组成的政党，就必然会是用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就必然会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政党，这样的政党也就一定能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更好地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为了解决党在思想上的建设问题，解决党员在思想上入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问题，延安时期，我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又一富有特色的重要内容。整风运动，就是党在自己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主观和客观条件具备时，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达到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因此，整风就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①

延安整风运动，冲破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并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间，一方面，我党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有了初步认识，逐渐成长起来；而另一方面，党内一些同志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僵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言必称希腊”，却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实际，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党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整套创造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党员的思想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保证了党进行自身建设和对中国革命政治领导方向的正确性。

延安整风运动，还为党在今后的作风建设——“理论和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对过去党内存在的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清算，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②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活的灵魂，要学会“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③ 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向。”^④ 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缺乏经验，党在对革命的领导上过分依赖别国尤其是苏联的经验。然而各国各有各的具体国情，别国的成功经验是建立在别国国情基础上的，并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的实际。苏联十月革命采取的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取得胜利继而取得全国胜利的做法，但是这种方法运用于中国却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前提下，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中国革命因此才取得胜利。所以，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去做“穷经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首”的“饱学先生”，而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在理论的指导下找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延安整风时期党所确立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对端正党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反复强调的问题。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①“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③革命的胜利就会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一宗旨，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就会胜利。什么时候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党就会不断发展壮大。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党从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了统一战线，为了民族的解放，“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自己的力量也发展壮大起来。抗战结束时，党已成为一个拥有 120 万党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04—1005 页。

的大党，根据地面积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军队 120 余万人。

延安整风时期，我党根据我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这个革命的根本特点，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待有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解决党内矛盾要发扬民主，和风细雨。通过这种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促进党员的自我改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内历次斗争经验教训的结果，而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对此在理论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肯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错误，相反，党敢于揭露自己的错误。有错误固然不好，但是也不可怕。有错误，别人提出来，自己做出反省，就改。改了就会像太阳上的黑子，“去之，人皆仰之。”而有错误，不让别人提出来，自己也不去正视它，错误就会不断发展，于是“人皆恶之”。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体现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博大胸怀，这是其他一切政党所不可能做到的。这条经验是党发展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经过了整风的洗礼和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数量上也大大增长了。党“已不像 1927 年那样，于横逆之来，无还手之力”。^①而是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并且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的各项政治主张、方针政策已为广大人民

^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05 页。

群众和各派进步民主政治力量所理解、所接受，党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这就为继之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胜利基础。解放战争开始一年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迅猛，革命与反革命在力量上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民党已从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而中国共产党则从开始的战略防守迅速地进入战略进攻，党员人数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更快的增长。到1947年底，党员人数较抗日战争结束时又增长了一倍之多，达到270万人，使我党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党。但是在另一方面，“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他强调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②在此后进行的整党工作中，我党着力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党的组织进行了认真的整顿，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顺利执行，纯洁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在政治上、思想上建党的思想，使我党即使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人数众多，工人成份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而保证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胜利方向，发展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

①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1253页。

在这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中，他的这些思想依然显示出巨大的指导意义，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影响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第五章 自觉实现由民族战争胜利 到民主革命胜利的转变

一、迎接民族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思想准备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阐明了我党在迎接民族革命战争最后胜利时应做好的思想准备。

（一）两个中国之命运

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反攻的阶段。

在苏德战场，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红军继续歼灭大量德军有生力量，光复了被德军沦陷的国土。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当地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在西欧，美英联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困兽犹斗的德国军队进行两面夹攻。曾经不可一世地要吞并全世界的希特勒，损兵折将众叛亲离，他的末日为期不远了。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也遭到盟军毁灭性的打击。在中途岛战役及后来的几次海空战中，日本海军几乎被葬送殆尽，美国海军

陆战队与日本陆军在太平洋上逐岛争夺，步步逼近日本本土，威力强大的 B—52 战略轰炸机，对东京、神户、大坂等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在东南亚，美英军队和中国远征军协调作战，亦歼灭大量日军。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了局部反攻，仅 1944 年一年，就与日伪军作战 2 万余次，毙伤敌军 26 万余人，俘虏 6 万余人，攻克县城 16 座，光复国土 8 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民 1200 多万。而在此期间的国民党战场，不但反攻乏力，而且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节节败退，更使河南、湖南、广西的很多名城重镇陷落。此役之后，蒋介石重新布置军队，在豫西、鄂西、湘西、桂南等战场发动攻势，收复了一些失地。

日本本来就是资源匮乏的岛国，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漫长的战线，将它拖得人力、财力日见枯竭，经济濒临崩溃。日本法西斯的最后灭亡，也是指日可待的了。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军民将几百万日军主力牢牢地拖在中国战场，使它无法分兵于其他战场，并一天天地被消耗掉。这不仅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也大大减轻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现在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代表的蒋介石，虽然坚持了抗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屈膝投降，但是始终不忘反共。八年中，他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甚至将真心抗日的一万多新四军战士包围歼灭，将叶挺将军和无数爱国者投入监狱。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越来越把重心转移到对付共产党上。1943 年，蒋介石授命御用文人陶希圣代他撰

写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竭力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他说，“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恶习，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自害不可。”^①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舆论机构竞相鼓噪，趁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叫嚷“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改编各地之‘红军’”等等。与此同时，驻军西北并长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介石亲信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对付日军的军队调往剿共前线，进行了多次挑衅，更准备大举进攻。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进步人士的反击下，以及国际压力下，最终被打退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共。

在1945年的元旦讲话中，蒋更提出召开排斥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实现所谓的“归政于全国国民。”这实际上是拒绝做任何民主改革，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

面对上述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便使全党认清形势，做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抗日战

^①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争的全面胜利，并且在日本投降后，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即将发动的新的反共战争。

1944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坪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召开七大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①

他简单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出，希特勒就快要被打倒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毛泽东说，中国的命运有两种，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即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一个新中国”。而黑暗的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或者说“一个老中国”。我们党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②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神圣的解放战争，终究能不能胜利呢？中国人民向往的光明的新中国的目标，终究能不能实现呢？毛泽东告诉全党：“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页。

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 121 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 9550 万人口，91 万军队，220 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有了这些条件，不仅可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可以在战后改变黑暗中国的命运，争取光明中国之命运。

这几方面的条件中，最为主要的是第一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产生以来，已经 24 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① 他向全党提出了七大制定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他预言，只要我党按照这一正确的路线，一致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争取光明之中国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含蓄指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代表着黑暗中国的命运，而中国共产党也要写一本代表光明中国之命运的书来，这本书就是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二）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日前途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27 页。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以重要的篇幅回顾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说，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他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这两条路线，即“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①

毛泽东追溯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批评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内反共，对外妥协政策。他也肯定了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客观事实，但同时又指出，国民党仍顽固保持其寡头专政制度，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反对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限制人民的抗日和民主活动。政府所坚持的这种压迫人民的片面战争方针，是不能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论述了这两条路线指导下的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国民党战场在武汉失守后，便实际上没有重大的战争。在1944年还使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广大区域沦于敌手。

解放区战场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0%左右和伪军的95%，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中流砥柱。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统治集团的错误路线，而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迭起的严重危机。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则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动员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国土。到七大召开时为止，解放区已开辟了19个，拥有了近1亿人口。

通过简明扼要的介绍，以及深刻的分析和鲜明的比较，毛泽东得出结论：

“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①

回顾历史是为了预见未来。通过对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析，鉴于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毛泽东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他说，“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②

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指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前途，也就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其一是：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他告诫全党，这种前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1页。

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这种可能性似乎就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坚持实现这种前途的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当然中国还有第二种前途，这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实现这种前途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和外国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及一切进步分子。

这样，毛泽东就以革命战略家的预见性，指出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切不要在胜利后丧失革命警惕性，要清醒地看到当民族解放战争胜利，民族矛盾下降后，国内阶级矛盾势必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将会日益尖锐化这一事实，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致在革命的转变关头麻痹大意、盲目乐观，而被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毛泽东特别提到了希腊的教训。1944年10月，德军在欧洲大陆败退，英军在斯科比将军的率领下，带着长期呆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驻希腊。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派“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也是有过沉痛的教训的。1927年，当国共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当公开的革命敌人——北洋政府将要土崩瓦解之际，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右派蒋介石，便把屠刀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当时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陈独秀看不到这一危险，一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1页。

地妥协退让，致使革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一度大好的革命形势被葬送了。

经过挫折和失败，中国共产党比较幼年时期逐渐地成熟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通过对国民党历史的分析，对它在抗战以前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和在抗战爆发以后顽固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立场的历史回顾，科学地预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并且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已经不同了，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过去幼稚而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了，而且国际形势的主要方面也是有利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不论遇到怎样的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毛主席说，“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①

外国友人爱泼斯坦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这样描述过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他说：

“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生和英国的温格特等军人。

今年（即1945年）四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织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要和双方做军事合作，这样来使任何一方投外国援助之机，以拒绝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3页。

② 《毛泽东印象记》。

历史的进程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

二、崭新的建国方略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以同样重要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这些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团结广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联合政府，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二十几年的奋斗中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列，领导人民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在新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仍将继续这一艰苦努力，为此，毛泽东为党和联合政府规划了种种任务和方略，以推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实现光明中国之命运的必由之路。

（一）历史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建立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是建立其他性质的政府和国家制度呢？毛泽东在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

第一，从国民党政府的18年的历史，特别是其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来看，中国的国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制度不加以改革，仍然保持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中国就只有黑暗的前途。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于1927年上台，它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残酷压迫工农，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连续进行了10年的“剿共战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当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面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一面疯狂迫害各界爱国人士，一面在日寇的嚣张气焰面前节节退让，又将华北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然而退让并没有使敌人满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敌人铁蹄的蹂躏。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灾难，不仅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致，同时是由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造成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18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①这样的政府是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

第二，由于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由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②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页。

② 同上。

艰难地发展起来的。它既反对帝国主义，又依赖帝国主义，既反对封建主义，又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上十分脆弱，政治上具有革命的不彻底性。孙中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等运动，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奋斗了大半生，但他的理想终究没能实现。而中国的无产阶级相对而言却比较有力，它们当帝国主义在华建立工厂时就诞生了，有比中国资产阶级更长的历史，而且身受多重压迫，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在它刚刚走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20多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有120多万党员、120万军队、19块革命根据地的大党，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心。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早已肩负了领导中国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式民主革命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建立一个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岂非梦呓？

第三，由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革命的任务仍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封建压迫，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①不完成现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对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来说，不是由某个政党，某些政治家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宏伟的目标，美好的蓝图

毛泽东勾画了一幅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蓝图，概要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并指出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一致的。

孙中山曾经说过，“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② 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外推翻民族压迫，对内废止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③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而由政府处理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的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国家的军队，应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而与一切属于少数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60 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56 页。

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并说过，“凡本国人及外国人的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说，“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①不但不反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保护私有财产，而且主张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也应如孙中山所说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②

毛泽东在概述了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般纲领后，详细地阐明了我党的具体纲领，即为实现上述一般纲领的具体实施方略。

他主要提出以下几方面的任务：

1.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赞成开罗会议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决定，反对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的妥协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其消极抗日的政策，将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人民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应该扩大队伍，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复一切失地，完成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权利。

2.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专政的政府，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人，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不废止这一政府，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仅不能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而且内战的惨祸将可能降临。

国民党提出要召开“国民大会”，实现“还政于民”，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因为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人民不能参加选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有自由，但国民党又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其实还是8年以前的“国民大会”，还是排斥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而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毛泽东指出，这样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结束，其步骤是：

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

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不管是临时的联合政府，还是正式的联合政府，都将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民主的联合政府应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即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思想信仰的自由，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使人民获得要求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建立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的人民

大众的联合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一旦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3. 土地问题

“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乃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但是国民党政府却长期反对实行这一主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在抗日期间，为了减少地主对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鼓励富农发展生产。当全国普遍实现减租减息以后，到了一定时候，再采取适当的方式，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对日本占领的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加以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兴趣势必增加。政府要帮助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中，努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3亿6千万农民是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军队的前身，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和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运动（如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大众文艺、国民卫生）的主要对象。因此逐步解决土地问题，将农民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对目前的抗日，还是将来的建设，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4. 工业问题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如果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也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中国工业的发展，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

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

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各项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国家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实行8小时到10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中国工人阶级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斗争中，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5.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在中国的80%人口中，扫除文盲、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积极地推广人民卫生事业，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经过不懈的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国家需要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在扫除民族压迫、封建压迫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将会起更大的作用。人民政府要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6. 少数民族问题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

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上述民族政策，并积极实现这一政策，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

7.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和投资等。

中国共产党同意关于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联合国的决定，并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我们认为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起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支持朝鲜的解放，支持印度及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南洋国家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即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建国施政方案。

（三）当前的任务

在党的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存在着三种绝然不同的区域，即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党在这三种地区的任务也是绝然不同的。因此，毛泽东区分情况，具体地论述了党在这三种区域中不同的工作任务。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是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仍在发展之中。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许多组织也发表了同类性质的宣言。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其领导者的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而要国民党采取适合时宜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也正在发展。毛泽东说，“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目标而汇合起来”。^①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应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目前国统区人民运动存在着两个弱点。其一，是处于社会基层的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被组织起来。其二，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

为此，毛泽东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②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们的同胞们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8页。

② 同上。

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火一样的愤怒，他们渴望着报仇雪耻的那一天。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鼓舞着他们，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

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①他要求沦陷区的共产党员，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共产党员应向一切帮助敌人的伪军、警察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要他们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罪。共产党员还应该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胜利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毛泽东说：“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②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加紧整训，并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0页。

应当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中，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很好地合作。

应当学会做经济工作，执行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动员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应当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应当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还是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政府就给以保护。

毛泽东的报告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代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建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和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他说：“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①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一个措施。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解放区代表大会没有如期召开。

至此，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都做了精详的阐述，为全党、全国人民描绘了一个未来新中国的美好蓝图，也树立了一个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斗志。诚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是没有困难的，日本侵略者是万分凶恶和残忍的，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2页。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们还有力量，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立场，不肯进行民主改革，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权利，凭借着美国的支持，还在随时准备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做“北山愚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①，从而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线，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而且还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以党的纲领的形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七大的一个重大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标志。

早在2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他的很多卓越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在革命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那时，他的思想常常被党内“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所排斥，不可能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党经过24年的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页。

命斗争的检验，经过胜利与失败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反复比较和鉴别，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批判教条主义，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经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积极倡导，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终于在全党达成共识，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这一地位并不是十分巩固的。这是因为：第一，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是未经共产国际认可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共产国际对由毛泽东这样一位未经苏联训练和“钦定”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始终存在疑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秋季，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担心中共会迷失方向，认为必须派“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予以帮助，于是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的王明，以及康生派回中国。王明和康生的回国，严重干扰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使党内一度出现了右的倾向。所幸的是这种错误倾向很快就被纠正了。在1938年夏，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说明情况，共产国际这才肯定了中共的路线，并做出了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明确指示。在这一基础上，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撤消了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至此，王明等人干扰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权的危害才得以真正排除。

第二，遵义会议虽然纠正和终止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但是，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这在当时那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做到的。而

且，“左”倾错误的发生，在中国，在党内，又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仅仅更换一两个领导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不在全党做一次认真的思想清理，不肃清“左”倾思想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人心。

于是，当党中央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局面相对稳定之后，毛泽东便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理论巨著，就是为了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彻底清算“左”倾错误，以夺取抗战胜利而撰写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认真清算，是从两条渠道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其一，在高级干部中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对1931年至1934年底的党的历史进行讨论，其二，在全党开展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

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而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高级学校的一些职员和教员为限，不超过300人。学习组的宗旨是：“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①高级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毛泽东选集》中《学习与时局》一文的题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到1943年间，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个时期内，领导全党高级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8页。

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①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的7个月的时间内，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先后举行了八次会议，终于在批判和纠正党的历史上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上达成共识，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

《决议》开宗明义就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②

《决议》在第二部分中说：“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10年内（1927—1937年——笔者注）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③

《决议》的第三部分，比较概括地论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实，及其对革命的危害。在这部分的末尾，这样写道：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我党经过了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7—9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

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①

《决议》的第四部分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其中包括：

关于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论述；

关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不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不平衡性的论述；

关于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的论述；

关于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各方面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必须实行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原则的论述；

关于红军必须以游击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发动人民战争的论述；

关于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在战术上实行速决战，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思想的论述；

关于在组织上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论述，关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与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论述；

关于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调查研究入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论述；

等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9—970页。

《决议》关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政策和策略的阐述，基本上总结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关于抗日时期的，《决议》说明要留待将来做结论），勾勒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宝库的大致轮廓。

《决议》还在以后的篇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①

从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条渠道的工作已圆满完成。另一条渠道，是通过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在全党普及和树立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二）全党的共同心愿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和逐渐为全党所公认，又是与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曾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典型的结晶体”，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义”的。^①

1941年9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未参加），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同志在讨论中，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做了高度的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②

1942年2月，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③

1942年7月1日，朱德撰写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中说，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④

陈毅也为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而发表了题为《伟大的二十一年》的文章。他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革命战争问题；苏维埃政权问题；建党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他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01页。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第502页。

④ 同上书，第502页。

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收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①

1943年7月，《解放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为纪念党的22周年生日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文章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在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②

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为纪念党22周年而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他在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文章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0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

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还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①从此以后，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人的讲话里，也陆续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了。

也就在这年的7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说：“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②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报告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遵义会议之后，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③在随后不久的另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又说，党中央老早告诉我们，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

1944年，在晋察冀分局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里，在分局下发的文件和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者的话》中，都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04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0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89页。

比较突出地讲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全党要广泛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彭真同志、罗荣桓同志也在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论及过“毛泽东思想”。特别是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将毛泽东思想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成为全党一致的信念，和对每个党员都具有约束力的纪律，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了。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①

新党章正式地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②

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文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06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69页。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①

他指出，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②

刘少奇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与解决过的问题。”^③即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的问题，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靠熟读、背诵和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就可以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做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第33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第335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的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①

完成这项特殊而困难的事业的，是毛泽东。指导这一事业战斗的思想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②

至此，“毛泽东思想”就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被正式确定下来。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正如前面所说的，是党的很多领导同志积极倡导的结果，是全党意志的反映，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旗帜

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毛泽东同志为当时还在进行中的民族战争和抗战结束后的民主革命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无疑将有利于这些方针、政策不受干扰地顺利地得以贯彻执行，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到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7页。

来。

其次，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中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观点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付一切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完成任何艰难困苦的工作任务的锐利思想武器。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使全体共产党员学习和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

再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组织和人民军队一直处于被分割的分散状态，各解放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对于共产党领导即将进行的全国性的解放战争，进而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来说，则是不能容许的。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克服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使我党成为一个有着世界最多党员的与领导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空前团结统一的大党。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舆论机器大肆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要求统一于蒋介石的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就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旗帜，有利于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

最后，确立毛泽东思想也是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我们党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但是这一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一结合的产物。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不论来自何方，都不能干扰我们党的行动。

自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就一直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

同志乃至全国人民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做为自己神圣义务和努力方向。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大批的干部，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它不仅在革命事业顺利时引导党和人民去夺取胜利，更在革命事业遇到困难时以巨大的凝聚力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它长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但是，也有极少数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自己的目的，曾一度把它引入庸俗化、教条化的歧路，加之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使得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课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这一课题。他在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对创立、完善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做了各自的贡献。这不仅是指毛泽东的著作曾经集中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全党智慧结晶这一层含义，同时也包括这些领导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而在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许多光辉论述。比如：周恩来和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论述；周恩来关于统一路线、关于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论述；朱德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陈云关于经

济工作的论述等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也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毛泽东在晚年的一些提法决策，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不仅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违反毛泽东一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这些思想则不应包容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之中。党内一些人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的命题，不是真正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这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

邓小平还亲自主持和领导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决议》中以专节的重要篇幅集中论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节中，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做了新的概括，而且提出贯穿于各部分内容中的三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这就是：

第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第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应我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从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到现在，已经近50年了，毛泽东逝世也近20年了，但是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停滞，更没有过时，经过新的总结和概括，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将更加显示出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仍旧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将引导全党和

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六章 人民的最后胜利

一、科学的形势分析，正确的革命决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独占抗日胜利果实，并为此不惜发动内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演讲和文章，提醒全党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用战斗来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权利。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命令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被日本政府拒绝。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9日0时，苏军分四路攻入我国东北。驻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迅速溃退。14日晚11时，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15日中午，天皇亲自作了“玉音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

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①

与此同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出命令，命令我军向附近之敌军发出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如遇敌拒绝，应予以坚决消灭，对敌伪所在之城镇及交通要道均应派兵接收，实行军队管制。

次日，延安总部又发出6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部、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及冀热辽解放区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令原来是东北军将领的我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向热河、辽宁进军；命山西解放区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

15日，朱总司令向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布命令，命令他，除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之外，凡被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部队包围的日伪军，须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其中华北地区日军，须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华东地区的日军，须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豫鄂两省的日军，须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广东的日军须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然而就在朱总司令发出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也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接连发出三道命令。一道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道发给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要“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第三道发给伪军，令其“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前去受降，而不允许其向共产党军队投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9页。

蒋介石下达如此蛮横的命令是有其险恶用心的。日本投降时，国民党所属部队大多在西南一隅。与日伪沦陷区犬牙交错地接壤的，是我党领导下的19块解放区，特别在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均无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存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长期与日本占领军及伪军战斗，他们无疑是最有权在这些地区接受敌人投降的军队。而且国民党军队远离敌占区，仅仅从迅速敦促敌军投降，并歼灭敢于顽抗之敌，尽早解放苦难深重的沦陷区人民这一点上来说，八路军、新四军等部也应有“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的义务和权利。

但是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却打的是另外一个算盘。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

“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

“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①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1—72页。

看来，蒋介石向不同的军队下达不同命令不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是由其美国“盟友”直接策划的。这是一个信号，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来说，这表明“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

还在7月底，蒋介石的嫡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就派所属暂编第五十九师、暂编第十五师、暂编第五十二师和预备第三师，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发起进攻。我军先主动撤离一些地区，然后于8月8日进行反攻，收复了失地。

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也是一个信号，表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反内战的强烈愿望，决心将战争强加于人民。

在这一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地于8月13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又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两篇评论，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这些文字，有的是讲给党的干部听的，有的是写给全国人民看的，有的则是直接回答蒋介石的，但其中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揭露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寸土必争，寸权必夺”，准备用战斗来保卫人民的权利。

（二）人民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温故可以知新。回顾历史，可以预知将来。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说，“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根据蒋介石在1927年、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表现，毛泽东一针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4页。

见血地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

政权，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是关系着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对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来说，同样也是根本问题。蒋介石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绝不会轻易将政权交给人民，为此他“宁可错杀一千，而绝不放过一个”。1937年，只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以武力占领全中国，推翻他的统治，他才被迫与共产党联合，共同抗日。现在日本投降了，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改变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性质，他当然不会拱手相让。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蒋介石“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①这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蒋介石必然会用他的几百万军队，用美国援助的飞机加大炮来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毛泽东说，“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③这些生动、通俗的比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十月革命的道路，暴力革命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打算主动向国民党蒋介石发动进攻。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了，远的不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1127页。

从1927年至1937年就打了十年内战，1937年至1945年又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广大中国人民饱受了战争的磨难，渴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这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为全中国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不赞成打内战的。但是，如果蒋介石一定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党的话，那么，“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①

（三）团结起来，壮大人民力量，才能制止战争，或者赢得战争

全国人民都反对打内战，共产党也反对打内战，怎样才能制止内战呢？

蒋介石的发言人说，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发表了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委员长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因此为内战找到一条借口。蒋介石说，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共产党没有交出军队，因此就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又为内战找到一条借口。

这给幼稚的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共产党交出了军队，服从了委员长命令，“原地待命”不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不去解放被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内战就可以避免了。

毛泽东提醒人们，这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而且直接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0页。

人们必须牢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几乎还没有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仅仅有少数持枪的工人纠察队。就是这些工人纠察队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向蒋介石交了枪。但是，这并没有使蒋介石不去屠杀他们。

人们必须牢记，蒋介石所进行的剿共战争，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那时的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中，但是内战却持续了整整10年。

人们必须牢记，十年内战的停止，“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抗日战争中的三次反共高潮和国民党军队的无数次挑衅，“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①如果共产党人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用包括战斗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会有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局面，更不会有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左右战争进程的是什么？使战争爆发或停止，胜利或失败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固然，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根本性质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是一切，敌我双方的政治力、经济力和军事力的对比也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早就否定过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历史上无数师出无名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得了逞，而正义的自卫战争却遭败绩。战争的正义性也是通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而发生作用的。因此，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

东说：“抗日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①要制止内战，得到人民应得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要力量。”^②

在回答“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个全国人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时，毛泽东着眼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即各方实力的对比，其中，“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③他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100万军队、200多万民兵”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内战的觉悟了的人民。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除了“力量”之外，“觉悟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条件，1927年我们在大革命中的失败，除了力量弱小之外，“觉悟程度”不高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觉悟程度”也是一种“力量”，或者用现代的说法，是区别于经济力、军事力等“硬”力量的一种“软”力量。

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以后，我们“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④

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觉悟以外，还要看人民群众的觉悟。因为，“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④虽然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空前地提高了，但是，毛泽东指出：“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页。

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①他认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错误的思想，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教育全党，“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揭露蒋介石妄图独占抗日胜利的果实，妄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②

有了“力量”，提高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全国人民大众的“觉悟程度”，那么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毛泽东肯定地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③“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④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两方，一方不要打内战，而另一方坚持要打内战，而前者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的时候，内战的危险还是十分严重的。因此，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⑤

后来时局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上述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

二、坚强的革命胆识，灵活的斗争策略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却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人民的权利，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同时也做出了重大让步，从而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我党争取和平的真诚态度，挫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的阴谋。

（一）针锋相对的谈判

1945年6月25日，何应钦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大约还要一年的时间抗日战争才能结束。但时隔两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一夜之间半个中国的原日军沦陷区成为真空。蒋介石虽然下令阻止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向日伪军受降，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将蛰居在大后方的“中央军”迅速送到原沦陷区。这就需要时间，“谈判”历来是战争中用以争取时间的惯用手法。于是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在接到第一封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①朱德总司令电，即《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之一，主要内容就是批判蒋介石给解放区军队错误命令之事。毛泽东这一回电，实际上是拒绝了蒋的邀请。

接到第二封电报后，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为代表赴

^① 《重庆谈判资料》第4页。

重庆谈判。不意蒋又拍来第三封电报，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①并特意说明，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蒋介石的电报都是通过中央通讯社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布的，这就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蒋介石是要和平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拒绝了他的邀请，就可以把爆发内战的责任强加给共产党。

在这前后，斯大林也接连致电中共中央。据师哲回忆：“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过了二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挑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②

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关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如果决策失误，将会给党、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国际形势，决策党的方针。

当时国际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政治动向是，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① 《重庆谈判资料》第7页。

^② 《在巨人身边》第308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的时候，美苏两大国为了迅速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也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曾经做了一系列交易。

美国在歼灭了日本海军和南洋诸岛的日本陆军，把战事推到日本列岛之后，曾做了一项估计，即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并迫使其投降的话，美军可能要付出 100 万人的伤亡。为了避免这一牺牲，罗斯福总统极力促使苏联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后向日本宣战。苏联则提出包括要得到中国的从哈尔滨到旅顺口的铁路、大连不冻港和维持外蒙独立在内的一揽子交换条件。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①

既然这些条件涉及中国主权，还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苏联又做出一项承诺，即与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还答应蒋介石提出的要美国为其装备 90 个师的要求。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附属文件正式签署了。国民党政府承认苏联要求的港口和铁路为中苏共同经营，承认外蒙独立，而苏联则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与国民党政府“密切友好合作”，援助中国的军需和物资完全供应“中国中央政府”，苏军在东北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也仅仅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除此之外，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还多次表明，苏联不会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赞成蒋介石统一中国。斯大林对美国人说：“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

① ②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编，第 1 册第 328 页。

完成中国的统一”。“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① 如果国共两党发生内战，苏联绝不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站在中共一方。斯大林想以此来说服中国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统一领导”，避免发生内战。

美国虽然明显地偏袒国民党蒋介石，但也不愿直接插手国共分争，杜鲁门认为，如果“为了击败共产党人……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必须将无限制的物资和美国军队投入中国去，美国人民是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阇墙之争”。^②

为此，美国、苏联和英国一致表达了希望中国和平而不要发生内战的愿望。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中说，三国一致“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③

斯大林还利用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再三向中共施加影响。事后，斯大林曾向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说过他此时的想法。他说：“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④

斯大林说的这种“联合政府”，与毛泽东在七大政府报告中所说的联合政府，当然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是保持国民党蒋介石占

①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册，第329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77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21页。

④ 《卡德尔回忆录》第34页。

统治地位的一个妥协的方案。

这一国际形势，对中国时局的发展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在8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就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进入和平阶段，短时间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国内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前方各解放区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内战是有可能避免也应当力争避免的。因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他说，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即使是暂时的和平我们也要积极利用和争取。”^①周恩来在会上也发了言。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新阶段的工作指导方针，即“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会议决定：周恩来立即去重庆，毛泽东随后不久也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称：日本投降以后，“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32页。

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实现和平，避免内战的六项要求，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同志分析了日本投降后两周内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毛泽东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②

8月28日，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张治中将军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

美国学者R·特里尔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的国民党，毛不得不对蒋以礼相待。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发生内战，毛不愿自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38—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1154页。

己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他去重庆的目的也在于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蒋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都重要。它及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一亿人口，并有 100 万军队听其指挥”。^①

他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坚持原则的必要让步

在这次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瞩目的国共两党最高级会谈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做出了必要的让步。毛泽东说，要谈判就要有让步，我们过去与蒋介石办交涉，也做过让步。我们“要以局部让步换取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②

在重庆谈判中，我党都做了哪些让步呢？

首先，在国民党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时，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即暂时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毛泽东说：“现在就全国性政权说，将是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联合政府的形式只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我们参加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③在《会谈纪要》中，写上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的措词。在《对美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中，毛泽东将战后中国的奋斗目标概括为“自由民主的中国”，具体说，“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及与各民主强国合作。”^④这一

① 《毛泽东传》第 222 页。

② 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 232 页。

④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0 册第 48 页。

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但对蒋介石的独裁政体却是一种否定。

承认了蒋介石的领导权，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建设战后之中国，这无疑是从《论联合政府》中的建国方案后退了一步。在国民党居于相当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对它的专制政治进行和平改革，当然是艰苦而又麻烦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将会延缓。但是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宁愿走这样迂回和曲折的道路，以避免大规模内战造成社会的重大破坏和人民的重大牺牲。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将放弃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也没有改变党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经过这个弯路使我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又说，“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②假如出现了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③当然如果蒋介石撕毁协议，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这一承认也将归于无效。

其次，在解放区和军队编制上做了让步。一些党内同志不理解，认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等八个省区的解放区太可惜。毛泽东解释说，国民党政府要回南京，这些省区的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

③ 同上书第1153页。

在军队编制问题上，承诺将人民军队缩减到24个师，甚至20个师，为国民党军队的 $\frac{1}{4}$ 。

但是这些让步必须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的让步。军队的缩减只是在编制番号上的缩减，并不意味着要交给蒋介石。正相反，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让出南方若干解放区，为的是集中力量争取东北和华北，实现党中央制订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而决不是白白的放弃人民的权利。

毛泽东在重庆逗留了43天，不仅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还广泛接触了在重庆的中外知名人士，其中有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还分别会晤了国民党人士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会晤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在会晤中，毛泽东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会谈签署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会谈《纪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②双方在《会议纪要》中还达成协议：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及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49页。

的政治协商会议等等。这些都是会谈取得的成就。

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达成了的协议还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而且和平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国共两党“一定要破裂，一定要打仗”的。但暂时的和平对全国人民也是有好处的，使国民党蒋介石向人民手中“抢桃子”时也多少有点顾忌。同时，他还告诫同志们，不要因为国共达成了协议而放松了警惕，“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道路是曲折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①他对各解放区的同志们说，“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不要被谈判束缚住手脚，对敢于来犯之敌，就要彻底消灭。“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②他还说：“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③他在赴重庆之前，曾和刘少奇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④果然，《双十协定》就是在我军全歼了阎锡山进攻我晋东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页。

③ 同上书，第1154页。

④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9页。

解放区的上党地区的 13 个师之后，才顺利签署的。

革命的原则性和革命的灵活性，是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区别的矛盾。毛泽东在对三五九旅干部的谈话中，曾生动地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比作松树和柳树。松树常绿风雨中巍然屹立；柳树插在哪儿都能活。他要求革命战士都要学做松树和柳树。他认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受到损害，这是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时，必须坚持的原则性。但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性的。为了有力地出拳，人们往往要先把胳膊收回来，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进攻，也常常要实行暂时的退却。政策和策略的灵活运用，正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必要手段。人类历史的无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成功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而能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达到高屋建瓴，左右逢源，无懈可击的程度，则是杰出的战略家的领导艺术之体现。

战与和，也是一对矛盾。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和平则是敌我双方实力平衡时的一种非流血斗争。战争与和平也一样是相反相成的。毛泽东早就说过，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列宁也曾经说过，“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如果为了求得和平而一味地妥协退让，那么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共产党和人民没有了枪杆子就将失去生存的权利。

总之，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参加重庆谈判的正确决策，以及在谈判过程有斗争，有让步的正确的策略，捍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强加于我党，和在谈判中利用其有利的国际地位压迫我党交出军队和根据地，从而实现其“政

令军令统一”的如意算盘，使我党在以后的谈判中，和在谈判破裂后的自卫战争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三、战胜一切反动派的科学论断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从而增强了敢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一）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国共两党的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署，给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然而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初衷未改。还在谈判期间，即9月20日，他就给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密电，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①同时下发《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墨迹未干，10月13日，蒋介石便向所属军队发出了“剿匪”密令，派兵遣将进攻解放区。1946年6月，他更悍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明目张胆地发动内战，主要是因为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79页。

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损失而且还大发战争之财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掌握了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原子弹。美国政府为了其在远东称霸的需要，竭力扶持蒋介石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杜鲁门总统亲自发表声明，称蒋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并公然指责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①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美国用大战剩余军事物资装备了国民党军队4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军事人员达15万多人（截止1945年10月）。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地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从东北、华北到华东、华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司令官称，在1945年8月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14万人到华北，还承认“在大战时候，美国空中运送军队，以此次运送为最大量而又是最复杂。”^②据统计，在8月28日至10月10日重庆谈判期间，美国就帮助国民党调运军队达80万之多。

除了运送军队外，在华美军于1945年10月还直接向冀东解放区的海阳镇、北戴河发动挑衅。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召开了包括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在内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共产党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指望“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同月，进攻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达120万之多，内战遍及11个省。1946年3月，美国派遣美军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来华；6月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援助了蒋介石。此外，蒋介石还得到了100万投降了的日军的武器装备。

与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美国全力援助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共

① ②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册，第407、396页。

产党却得不到社会主义苏联的丝毫支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之后，苏联以法律的形式表明了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换一角度说，蒋介石政府以承认苏联在东北的若干特权为代价，换取了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不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承诺。

苏联此举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战后初定，百废待举，面对在大战中急剧膨胀的美国，斯大林心存疑惧。他害怕直接与美国对抗，害怕掌握了原子弹的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受这种恐美、恐原子弹心理的驱使，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向美国做出一系列妥协。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一些本来掌握了相当实力武装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交出军队，换取了政府中若干席位。但是，正如法国共产党后来总结的那样，“当工人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时，资本家们就马上把它抛弃了。”^① 时隔不久，共产党的代表被逐出内阁，人民曾付出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权利，顷刻间化为乌有。其时，斯大林也将中国革命事业当作向美国妥协的筹码，要求中国共产党走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所走的道路。

国际上的这一态势，极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而使我党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利地位。一位美国外交官曾说，由于俄国态度，“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大削弱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对着有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到底敢不敢于奋起抵抗，用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32页。

战斗来保卫人民的生存，这种抵抗有没有胜利的可能，成了摆在全党、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同情中国人民革命的友好人士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一时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向全世界宣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大胆而又科学的命题，是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发表的。

1946年8月，在全国内战爆发两个月之际，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延安的一处普通的窑洞旁，会见了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便发表了。

（二）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论证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

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

因为斯特朗是长期居住在苏联的美国记者，她的报道又是面向世界的，所以毛泽东专门援引了几个世界历史中的事例。他列举了俄国二月革命前的沙皇，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代表德国法西斯）、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它们的最终的失败，证明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列强不过是一只只纸老虎。

面对蒋介石和手中操着原子弹、妄图称霸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也一言以蔽之：“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①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形象而又生动的口号，是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的命题。

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证明，任何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势力，都有其发生、发展、衰落和灭亡的变化规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必定会战胜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尽管在开始时，前者的力量相对弱小，而后者的力量相对强大。正如后来毛泽东进一步论述的：“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们所推翻。”^②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重性，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说它是纸老虎，是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是终究要灭亡的，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它还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它还很强大，它还是真老虎、铁老虎，它还要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

革命事业必将经历“长期艰难困苦的时代”，准备走“弯弯曲曲的道路”。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在战略上藐视它，即把它看作是纸老虎，树立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战术上重视它，即把它看作是真老虎，从而认真对待，一点一点地战胜它，切不可盲目轻敌，麻痹大意，否则就可能被真老虎吃掉。

这一重要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在随后不久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又做了更为透彻的阐述。他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①毛泽东教育全党同志，如果在全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因而不敢去推翻他们，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如果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只要我们真正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能够保证人民的革命事业无往不胜。

（三）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他说，虽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

争胜败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是毛泽东曾经反复论述过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曾经说过：“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②“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力去努力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③

在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不久，毛泽东就批判过过分迷信原子弹的错误观点。他否定了原子弹能解决战争，原子弹使得日本投降的说法。他说：“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④毛泽东说，党内这些迷信原子弹的同志，看问题还不如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英国蒙巴顿勋爵。因为蒙巴顿曾说过，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错误。

破除对原子弹的迷信，消除唯武器论的影响，为的是提高我党我军必胜的信心。毛泽东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⑤

（四）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回答了人们关于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疑虑

毛泽东说，美国反动派虽然非常痛恨苏联，梦想消灭这个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2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会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在没有控制美苏之间辽阔的“中间地带”，即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毛泽东认为，只要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在与斯特朗谈话之前几个月，毛泽东还撰写了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党内文件，专门回答了所谓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危險虽然存在，但是由于“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因此，“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險”。^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相继建立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蒙古和北朝鲜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由大战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苏联，发展成拥有数亿人口，横亘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也包括占世界人口的 $\frac{1}{4}$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空前壮大。而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则除了美国之外，英、法、意、德、日等主要国家的实力，都在战争中受到挫伤。世界呈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格局。因此毛泽东得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的结论，并且由此断言，虽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險是存在的，但是人民的力量必能克服战争危險。他预言，世界资本主义阵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4页。

的代表——美英法等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苏联，或迟或早总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当然这不是说能在“一切”问题上都达成妥协（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而是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而不致于诉诸战争，特别是世界规模的大战。

毛泽东强调指出，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因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①只有民主势力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迫使反动势力承认暂时不能消灭之的时候，和平、妥协才能够到来。毛泽东这一思想与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以斗争求妥协则妥协存，以退让求妥协则妥协亡。

毛泽东在预见美、苏可能妥协而不致爆发大战之后，还特别指出：苏联与美、英、法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就若干国际问题达成妥协，这是对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②

这段话是说给斯大林听的。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大国沙文主义做祟，他常常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其大俄罗斯服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当时的中共领导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5页。

号，使共产党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为了避免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遭受德日两面夹攻，曾多次要求中共所属之八路军出长城，甚至开到内蒙、外蒙地区，以牵制日军，而在当时，解放区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与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且有制空权的日军正面遭遇，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毛泽东当时曾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八路军会自然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熬过今明两年“才可能采取大的作战行动”^①。而这一态度，曾被苏联人认为是“不关心苏联的命运，不关心世界革命的前途”。斯大林为此对中共甚为不满，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因为担心苏联再次卷入与美国的对抗，而要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向资产阶级妥协，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蒋介石妥协。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捍卫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的正当权利。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独立自主的思想，才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斯大林后来也表示：“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②

与“独立自主”思想相关联的，是“自力更生”的思想。处于毫无外援不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把人民革命事业坚持下去，就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毛泽东在日本刚刚投降时就说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

① 转引自王庭科《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第266页。

②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

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

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毛泽东又一次重申：“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②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光辉论断，关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通过斗争必能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论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权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人民革命的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当时面对强敌而又毫无外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使党和人民树立起坚强的决心和信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小米加步枪去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

四、彻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战略决策

面对由美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数百万正规军和飞机大炮，毛泽东敢于从战略上藐视他们，称之为“纸老虎”，这是因为他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得到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特别是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支持。共产党怎样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1188页。

呢？这就是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获得利益。当与代表三座大山在中国最后统治的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最后决战之际，彻底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了。

（一）历史的回顾

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是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提出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就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向封建地主阶级做斗争。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使以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大革命一度曾轰轰烈烈，胜利在望。但是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期间，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将农民的觉醒和解放视如洪水猛兽，党内位居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害怕因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农民土地关系的变动，会使国共合作破裂，而千方百计地限制农民运动。毛泽东则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力赞扬和支持了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则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以此博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如鱼得水，从而战胜了蒋介石多次重兵围剿，革命根据地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如星火燎原，遍布了全国许多省区，红军也越战越强，最多时曾达到30万。毛泽东称“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任何反革命势力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可惜后来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党和红军终于还是保存下来了，当党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后，红军就又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也重新恢复了生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近逼，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救亡的大业，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提出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在内的四项保证，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此后，党在农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毛泽东后来说过，解放区军民能够在毫无外援的情形下，抵抗了半数以上的敌寇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克服了灾荒，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终于配合盟国军队打败了敌人。解放区的这种伟大力量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就是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援助。是亿万农民用自己的优秀儿女和五谷杂粮支撑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二）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胜利后，面对新的形势，1945年11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他说，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为此他要求，在1945年冬至1946年春，在全国各个解放区，特别是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①他指出，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包括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包括生产）。

一个月以后，12月25日，毛泽东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把减租列为全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他说：“各地务必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页。

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他明确指出了减租减息工作的重要性，即“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①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是决定国共两党孰胜孰负的关键。

在东北地区，苏联红军击溃了日军，但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红军将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移给国民党军队和官员。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远离大城市的交通干线和东满、北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因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②

毛泽东在布置减租任务的同时，还指出了减租工作必须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减租必须是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的恩赐，这是减租成败关键。”减租不仅仅是改善贫农生活的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因此，“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③以巩固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5页。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0—1181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告诉全党：目前我党的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1946年，我党在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关于农村问题的提法是：“实行农业改革，扶助农民组织，推行全国减租，适当的保护佃权，并保证交租……”^① 在与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纲领和协议中，关于农村土地问题，还是以“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护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② 为近期目标，实行土地法，达到耕者有其田，是做为远期目标提出来的。在我党还没有放弃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努力时，在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公开决裂之前，我们的土地政策还暂时限制在“减租减息”范围之内。

（三）决定性的过度——《五四指示》的颁布

1946年春末夏初，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政协协议和国共停战协议，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国共两党的彻底破裂已无可挽回，在这一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土地政策，标志这一改变的是1946年5月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指示指出，在各解放区开展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有的群众情绪极高，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党中央认为，应该坚定地支持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批准农民已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

党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

我党目前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88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108页。

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①

《五四指示》规定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若干具体政策：

1. 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2. 团结中农，使其获得利益而不可侵犯中农利益；3. 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4. 对抗日军人及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者，谨慎处理，适当照顾；5. 将中小地主与恶霸地主区别开来，给以一定的照顾；6. 向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做坚决斗争，没收他们的土地，但仍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的必须的土地；7. 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外，对一般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予以保全；8. 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外，一般不要杀人，也不要多捉人；9. 争取、教育知识分子；等等。

鉴于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最后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五四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而是除了没收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及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五四指示》还指出，中央尚未明令全部废止减租政策。目前政策的改变，是由于清算减租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实际上不能不依照目前广大群众的要求”而做出的重要的改变，但还“不是全部改变”。^②

同年10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其中一项指出：“3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164—166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第164—166页。

央5月4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为此，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的领导“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①

1947年2月，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了为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而必须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是军事问题，第二是土地问题，第三是生产问题。在土地问题中，毛泽东说，几个月来各解放区都有 $\frac{2}{3}$ 的地方执行了中央的《五四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另外 $\frac{1}{3}$ 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再次重申了党的政策，即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豪绅恶霸分子必须受到惩罚，坚决地联合中农，不许侵犯中农利益。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90%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②

（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22万国民党军队围攻鄂豫交界的我中原解放区，拉开了全面进攻的序幕。接着，又大举进攻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各解放区，从此全国范围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全面内战的爆发，标志着从1937年建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标志着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的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了重大变动。在中国，中日矛盾解决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它们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此时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再是“人民”的一员，而成为了“人民公敌”。从表面上看，现在时期比抗日时期，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其实是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扩大了，都巩固了。因为我党可以放手实行农村的土地改革，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使占人口90%的农民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世代渴望的土地，并且组织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实行这一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对于发动群众，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解放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国际国内社会矛盾变化的情况下，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1947年9月，我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与会同志详细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和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这一文件，要求各地民主政府、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讨论和采纳这一土地法大纲，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我国历史上，也是我党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法大纲。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渴望得到土地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

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①

《土地法大纲》比《五四指示》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也修改了原指示中“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的规定。

但是这次土地会议对某些地区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土地法大纲》提出的对乡村“一切土地”实行“统一平均分配”和中共中央工委提出的“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都是不妥的，助长了党内“左”的错误的发展。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在新老解放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但他当然地是党的土地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他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动向，及时地纠正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偏差，牢牢把握着航船的舵轮，引导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进行。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做了简要的回顾，重申了我党“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②的方针。同时他也指出，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0页。

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不应重复。

毛泽东在这一部分的末尾这样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重大意义：“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其中第二部分即是“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谈及土地改革中的12个具体政策问题，他强调，土地改革运动必须发挥贫农团在乡村政权中的带头作用，必须将贫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必须注意团结中农，不能抛弃中农而由贫农包办一切。毛泽东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正确的口号应该是：“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②

针对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出现的过火行动，毛泽东逐项加以纠正，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于学生、教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

教授、科学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提出必须对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对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恶霸地主和非恶霸地主加以区别，在打击地主分子时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① 因此，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他们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则应予以适当照顾。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了要团结中农的政策。他说，“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 20% 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② 他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时，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③ 对于富裕中农的土地，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他还说，“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他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着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④

（五）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重点指导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越来越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回到人民手中，土地改革运动也迅速向广大新解放区扩展。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土改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密切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4 页。

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48年2月，在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他第一次提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这就是：

在第一类地区，即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由于早已分配过土地，因此只须做部分调整，不必再重新分配一次土地。

在第二类地区，即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从1945年至1947年8月）之间所解放的地区。这里“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①

在第三类地区，即大反攻后的新解放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提出“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再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他预计前一阶段须有两年时间，后一阶段也须一年。“太急了，必办不好”。^②

上述电报之后12天，毛泽东又专门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重申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须分两阶段进行的意见。他更进一步指出，在上述第一阶段中，在实行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政策时，又要分几个步骤，即先打击大地主，后打击一般地主，对恶霸地主和非恶霸地主，对大、中、小地主都要区别对待。同为新解放区，又可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逐步进行土改，而在游击区应先做宣传组织工作，暂不进行土改，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专门撰文对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8页。

错误观点，给予及时的纠正。

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继完成，由战场上的胜利而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就成为全党土地改革运动的重心。为此，毛泽东又多次撰文，对这些地区的土改工作进行了及时指导。

在给邓小平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论述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电报指出，在某一地区刚刚解放以后，不要过早地分浮财，分土地，而应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这样做，“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可以保证既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新解放区应“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的条件下，再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新解放区，这一减租减息阶段都是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①

在此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他又将上述意见进一步深化了。他说，凡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

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6页。

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

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

毛泽东认为，“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 1948 年进行土改的范围。”^①

毛泽东对广大解放区，特别是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上述指示精神，体现了他凡事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根据各阶级乃至一个阶级中不同阶层的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在步骤上循序渐进，不简单划一，不急于求成，充分地依靠群众，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发动群众，但同时又不迁就群众的自发行动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老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数以千万计的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真心地拥护共产党，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民兵、妇女积极支前。1946 年 7 月至 10 月的四个月中，各解放区共有 30 万人加入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相争”，“村干带头”的动人景象。总之，土地改革的胜利开展，使我党我军得到了巩固的后方，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从而形成了足以淹没蒋家王朝的人民战争的海洋。

美国学者 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记述了毛泽东在延安失守后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特里尔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29 页。

接着评论道，“毛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赢得了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了战争。而蒋不了解这一点。”^①

五、第二条战线的辉煌

与人民解放军狂飚式地横扫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国统区人民大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由于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各种社会矛盾所促成的国统区人民空前觉醒的表现，也是我党贯彻执行毛泽东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结果。

（一）国统区人民的新觉醒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蒋介石在广大国统区，特别是原沦陷区的威望是很高的，人们把他看成是坚持抗战直到胜利的民族英雄。但是不久，人民就失望了。这是因为第一，蒋介石公然违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一再撕毁和平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大内战，这就把自己放在了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抗战胜利后，久经战火涂炭的广大人民盼望和平，期待着国共两党坚持合作，以便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和平建国。蒋介石尽管耍了一些和平的花招，但是那不过是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他执意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初衷始终没有变。虽然他掌握着国统区的宣传机器，大肆攻击是共产党发动内战，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中共在谈判中一再让步，争取和谈能够达成一致。恰恰相反，撕毁

^① 《毛泽东传》第234页。

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到处发动进攻，抢战地盘，先是攻占中共在华北的驻地张家口，继而进犯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把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投入战争深渊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意愿，但是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945年11月26日，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3万名学生宣布总罢课，向国民党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等要求。结果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闯入学校，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致使4人死亡，25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赴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上海10万群众集会，并举行反内战游行。当代表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遭到特务围攻和殴打。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人们渐渐认识到只有彻底打倒蒋介石中国才能有和平。

第二，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暴露了其卖国的嘴脸。蒋介石要想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只有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为此，国民政府与美国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1946年10月，成立了所谓“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须交美“当局”裁判。同时，北平国民党当局与驻华美军签订了《中美警宪联合勤务协定书》。协定书规定，美军人员肇事须由美国警宪处理，中国当局只有旁听的权利。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签署了。按照这一条约，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等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任何

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对中国的出口，“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一切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在紧急危难时，美国军舰也可以开入中国不开放的口岸、地方和领土。这个条约从表面上看，中美双方是“平等互惠”的，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实际上是保证了美国在中国的特权。爱泼斯坦评论说：“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同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条约当然是完全不平等的。”^① 12月20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在南京正式签定生效。根据协定“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的领空到处飞行，除了转运和装卸客货，还被允许做非交通性的停靠，”即拥有军事降落权。

此外，在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横行霸道，到处欺压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人被害死伤者达3300人以上。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美军军车肇事1500起，强奸中国妇女300余人。连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也说，美军在上海的非法行为，“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②

从日寇铁蹄下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又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凌辱，他们看清了前门拒虎，后门揖狼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被称作民族英雄的蒋介石。1946年底，北平学生因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反蒋运动。运动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之多，规模超过“一二·九”运动。

①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418页。

② 《美国与中国》第244页。

第三，国统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各阶层人民濒临贫困、破产的境地。

由于美国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美国的廉价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据 1946 年海关统计，对美贸易额已占到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 53.19%，1947 年，美在华投资占外国全部投资的 70%（1936 年仅占 8%）。美国商品到处排挤和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例如，上海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中，美国货占到了 80%。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和美国资本相结合，垄断了中国的国民经济。由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银行存款额占国统区全部银行的 90%，他们经营的各种贸易公司，垄断了矿产原料、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的对外输出，和工业品、日用品的对内输入，垄断了食盐、矿、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购销。据 1947 年统计，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 2/3，操纵了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使民族工业、商业及金融业受到致命的摧残。1947 年国统区工业产值较 1936 年减少了 30% 以上。

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党政府和军费开支与日俱增，竟占到总财政支出的 80%，因而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1947 年的总收入为 14 万亿法币，而总支出竟高达 43 万亿法币，亏空了近 30 万亿。为了弥补赤字，政府疯狂地加印纸钞，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1947 年美联社发表的一则材料称，100 元法币在 1937 年买 1 口猪，1943 年买 1 只鸡，而到 1945 年仅能买 1 条鱼，1946 年买 1 只鸡蛋，1947 年则仅值 1/3 盒火柴了。再加上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广大劳动人民、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境地每况愈下，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有人不禁发出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了“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倒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①的惊呼。

第四，国民党政府对原沦陷区的掠夺性“接收”，激起了各阶层人民强烈不满。日本投降后，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向沦陷区派遣了大批军队和官员前去接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达6200亿法币。这些资产都被四大家族控制的部门所占有，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鲸吞了。

这些接收大员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诬指为“敌产”而加以没收，严重地摧残了民族工业。在上海没收民营工厂3419家，经如此掠夺性的接收竟倒闭了2597家，占原数的75%。

在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以大大压低币值的办法收换日伪货币。1945年9月和11月，国民党政府先后公布了对流通于华中、华南的伪币“中储券”和流通于华北的伪币“联银券”与国统区法币的兑换率分别为200:1和5:1，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而按当时这些地区与国统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应为35:1和0.5:1。这样仅此一项，国民党政府就从原沦陷区人民手中掠夺了2亿美元。

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各级接收机构和接收大员们竞相抢夺金条、房屋、汽车，盗卖或瓜分敌伪资产，搞得乌烟瘴气。结果真正收归国库的敌产不足1/5，绝大部分为官员据为己有。这种接收被时人讥之为“劫收”。沦陷区人们广泛流传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表达了人民的愤懑心情。《大公报》载文称：国民党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片胜利的灾难。”文章说：“这一带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

^① 《商务时报》1946年7月8日。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①“美国官员也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②

上述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迅速觉醒，认识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失去了对它们的希望和信心，形成了极好的革命形势。

(二)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好的革命形势，如果没有革命政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还是不能战胜敌人

毛泽东就这一点曾明确地告诫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③3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经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促使统治集团中发生严重分化，革命出现了好的形势。但是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奉行“左”的关门主义的路线，结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使蒋介石得以将对手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我党则陷于孤立的困境。

现在，当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党已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成熟的时候，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毛泽东在1946年10月的《三个月总结》中指出：“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情况的认识，很快的提高了。”^④广大群众在对美国

① 《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8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页。

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谈道：美蒋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他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蒋管区人民的作用，他说，“蒋介石区域的伟大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①

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明确提出的为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而奋斗的目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的继承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毛泽东还将统一战线提到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高度，以引起全党的重视。那时的统一战线包括了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即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破坏国共合作，公然发动内战，成为人民的敌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还要不要坚持，在新的形势下应做怎样的调整？毛泽东在这里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

题。

1947年5月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再一次提出：“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他说，“现在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是这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一切社会同情都是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①

在1947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七部分，专门论述了党在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他说：“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的扩大了。”^②

这是因为：

第一，在抗日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人民中还有一定的威信，现在他们已经威信扫地，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

全孤立了。那时，还有一些人怀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主张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建国方案之外，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在这些幻想已经完全破灭了。国统区人民的觉悟空前的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戴，而且在国统区，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大城市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民的拥护和信任。

第二，由于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的衷心拥护。

因此可以说，现在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巩固。毛泽东接着强调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胜利的，而这个统一战线要是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是不可能胜利的。

（三）正确的政策，胜利的斗争

为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主张在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中，继续实行在抗日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三三制”政策，即在政权机构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外，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除汉奸和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批判了一些过“左”的错误做法，明确阐述了我党对统一战线中的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者，毛泽东认为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的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他在后来撰写

的《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中，重申了上述观点。他说：“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①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的领导避免对他们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他说，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他在另一篇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将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称为“和体力劳动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②认为也应包括在“劳动人民”的范畴内，而成为构成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体之一部分。

对于开明绅士的政策，毛泽东也多次加以阐明。他说，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页。

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各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斗争。

在题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对美蒋反动派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毛泽东指出：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些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主要因为他们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改，对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在现阶段，只要他们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我们就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专辟一节论述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他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是：

第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第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他强调说，“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毛泽东以农村中党对中农的领导为例做了具体的说明。他说，党要领导中农，就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做坚决的斗争，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并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否则，中农就会动摇。同时，还要将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和财产分配给中农中较贫困者，对于较富裕的中农，也不应损害其利益。在乡区政府和农会，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使其占到委员人数的 $\frac{1}{3}$ 。还有，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的摊派也要公道。除此之外，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没有上述这一切，党就可能失去中农的拥护。

最后毛泽东说，“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①

在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党加强了对国统区的工作。1946年12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主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的各中央局、分局党委也都设立了城工部。

1947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示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①

由于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特别是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人民群众的反蒋斗争方兴未艾。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在遭到特务镇压后,各校立即罢课以示抗议,北平的学生也起而响应。5月20日,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同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与前来镇压的宪警发生激烈冲突,被殴伤、逮捕数百人。“五·二〇”血案后,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等4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也以各种形式支援学生运动。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知名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演说,致函,捐款,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统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内战、反美帝暴行的罢工和游行,罢工次数达3000次。城市贫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的若干民主党派,也表明了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立场。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抵制了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

^① 《周恩来选集》第7卷,第269页。

空前孤立了。

正如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指出的那样：“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①“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②在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催生下，一个崭新的中国就要呱呱落地了。

六、夺取最后胜利的行动纲领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解放战争已走向最后胜利的道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为了整个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中共中央于1947年底在陕西米脂县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为夺取全国政权制定了完整的行动纲领。此后至党中央转入西柏坡之前，他又为此提出了若干做好政策准备的重要思想。

（一）克敌制胜的军事原则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它贯穿于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在解放战争后期，就是要为夺取政权这一政治目的服务。在这最后决胜的阶段，如何卓有成效地赢得战争，就成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7页。

1. 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第一天起，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卓越的军事家，在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不仅谙熟军事战略，而且对战术战法也有精深的研究。他善于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把前线指挥员在成功战例中发挥出来的指挥艺术提炼、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战术思想。他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三部分阐述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他战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这十大军事原则是：

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③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④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人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连打几仗）的作风。

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①

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②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军事著作中可以看出，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所概括的十大军事原则，是逐渐地清晰、完善起来的。

十大军事原则中的第一条，第五条，第六条，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我军在以往的作战中正是遵循了这些原则，才使自己逐步壮大和成熟起来。

第二条军事原则的基础思想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根据地，“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应当“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③这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9页。

仅是因为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首先占领了这些地区，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这些地区还较有力量，同时也是因为我党只有占领了广大农村地区，并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获得充分的兵源和物资供应，才能获得战胜国民党蒋介石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三条军事原则的雏形，则见之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毛泽东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还十分弱小，基本上是以游击战为主。在抗日时期，面对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日军，我军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现在，虽然我军在数量上还不占优势，但是已经是拥有100万的正规军和200万民兵的强大的武装，已经有能力在运动中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由此，基本的作战方法就不再是游击战，而是运动战了。毛泽东文中提出了“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①这正是第三条军事原则的具体体现。

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就是对十大军事原则中第四条原则的最为精详的论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指出，“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有效地打击敌军，使其被歼一部就少一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因为这不但是我军武器弹药的最主要的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为了有效贯彻这一原则，毛泽东要求，应“以歼灭敌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①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在红军时期极力倡导的重要军事原则，并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做过深入的论述。红军从建军开始，10余年以来一直坚持这一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时期，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这一原则的运用也就有所侧重，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些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而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虽然主要围绕“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这一点而谈，但实际上已经论述了后来被改为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九条原则的大部分内容。

1946年10月，毛泽东撰文总结了全面内战爆发后3个月的作战情况。在这篇《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认为正是由于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才取得了3个月歼敌25个旅的战果。他要求，“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应学会此种作战方法”，“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②足见其在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葭县朱官寨，为党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以一节的篇幅总结了我军在一年的反蒋战争中形成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他依次论述了九条作战方针，或称军事原则，与3个月后起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相比较，前九条的概括与表述基本相同，只有第十条尚未论及。

根据战争发展进程，我军的任务不但要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需要以攻坚战来夺取敌军固守的城市和据点，因此，毛泽东提出以往不曾谈及的两条作战原则。其一，是“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其二，是“一切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①

到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十大军事原则完整、系统地提了出来。

2. 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光辉体现。

这十大军事原则从字面上看，是克敌制胜的一般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似乎任何军队都可以掌握，可以实行。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3页。

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①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工作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政治资本。因此，能够在统一的指挥下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而国民党军队虽然名为“国军”，其实乃是新旧军阀的私人工具。军队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蒋介石以黄埔系为自己的嫡系部队，其他则视为“杂牌”。非嫡系的杂牌军不但装备、待遇差，打起仗来却总是被安排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随时都有被消灭、被兼并的危险。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常常是徘徊观望，畏缩不前。因此，国民党军队尽管号称数十万数百万，但不能统一行动，集中兵力，结果每每被我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我军的广大指战员，都是拿起武器的农民。我党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改革，得到亿万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自身利益而战，人心所向，士气高涨。而且，在人民军队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官兵平等，干部和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起表率作用。所以，虽然部队中的条件艰苦，但士兵心情舒畅，所以能“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即使武器装备比不上国民党军队，但却可以以人的精神优势来弥补物质条件的欠缺，创造出诸如“用双腿追赶汽车”，“用手榴弹战胜坦克”的奇迹。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还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阶级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运动,更是“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的团结。”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群威群胆,英勇杀敌。毛泽东说:“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①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多是农民,但是他们是从农村抓丁抓来的,他们不愿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卖命,加之国民党军队中等级森严,官兵尖锐对立,打胜了仗当官的领赏晋级,打败了当官的率先逃生,因此广大士兵“人心不顺,士气不高”,厌战情绪很强烈,很普遍。有的一经我军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便纷纷逃亡,或投诚。这样的军队,即使配置了再先进的武器,也不可能在与人民军队对阵时取胜。

我军长期扎根于农村,在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不依靠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生存,因此在作战中能够机动灵活,不以保存城市为作战目的,也不必为此而分散兵力,于是可以甩掉包袱,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军队,依靠的是美国的援助,失去了大城市,失去了机场、港口和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就不能存活。所以,每到一城一地,必要分出一部分兵力守备,背上一个个沉重的包袱,使野战力量一点点被削弱。其军队总量虽然十分庞大,但仍因战线太广而感不足。毛泽东称,“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5页。

以上就是我军能有效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战胜敌人，而敌军却不能利用来对付我军的主要原因。

十大军事原则一经毛泽东总结提出而推广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的正义之师，更如同猛虎添翼，攻必克，守必坚，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蒋介石的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军”，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把他们赶下大海，打出一个人民的江山。

后来，毛泽东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①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宝贵的思想武器。

（二）建设新中国的经济纲领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向全国推进，即将最终砸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时，毛泽东又以宏大的气魄和务实的精神，思考着、决策着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需要用新国家的建设来巩固和发展，而为此个新国家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就成为应该首先着力解决的课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中，再次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规划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强调发展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集》第363页。

产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进一步统一和武装了全党的思想。

1. 三大经济纲领的确立。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①的三大经济纲领，体现了破坏旧经济和建立新经济的高度统一。通过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垄断资本，就最终从经济上完成了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立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样，三大经济纲领，三大支柱，就构建起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切实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自觉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曲折，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总结历史经验中终于为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制定了一整套符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党成熟的又一显著标志。没收地主土地纲领的提出，表明土地问题彻底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土地问题已另有专节论及）

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在民主革命将要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已成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命脉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提出的新课题。此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国民党还是以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统一战线的一员，还是我们的盟友，因此，毛泽东无论在《新民主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论》中所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应归共和国所有，还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应当没收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时，都没有涉及四大家族问题。到了现在，投靠美帝国主义，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彻底清算蒋介石集团的罪恶，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已成为现实的可能。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压迫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损害中产阶级，并同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摧毁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这个经济基础，国民党反动统治就不会彻底轰塌。而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当权的20年中，已集中了价值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在抗日战争及其以后发展到了最高峰。这些财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一旦没收其为人民所有，就必然成为新中国的雄厚经济基础，使我們在新中国一建立后，就能有秩序地立即进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工作。

把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到经济纲领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显著特色，而且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这些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允许“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①。对于一切小工商业者，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②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于发展经济有益。这是因为，我们有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有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业经济，再加上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就完备了，就能从各个方面推动社会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在透辟分析三大经济纲领的基础上，毛泽东规划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这就是：

(1) 国营经济，这是靠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产业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

(2) 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3) 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③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即是“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④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我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侵犯工商业者利益，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等。毛泽东说，这些错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⑤在后来不久写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一文中，毛泽东要求纠正那种“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

① ②③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①的方针；要教育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使他们懂得，决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他指出，应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标。

2. 努力发展生产

努力发展生产，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重视的问题。抗日战争中，他领导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战胜利后。他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的时候，更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各种物资的支援，为此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在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时，他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他要求“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心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工业生产上面。”^②

发展农业生产，还不仅仅是为了当前的支援战争的权益之计，更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长远大计。毛泽东说，“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5页。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页。

在强调增产的同时，毛泽东还反复强调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问题。

他说，“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①“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 and 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②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上述正确的经济政策，尽一切努力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使我们赢得了这场规模空前的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使国统区的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工商业得到了尽可能快的恢复，为建国后我党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夺取全国政权的政策准备

在《蒋介石政府正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的末尾，毛泽东庄严提出：“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③ 尽管这时蒋介石的势力还未全部从大陆上被清除，但是他们的败局已定，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同时，也开始着手为全面接管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做准备。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后，这种准备工作便逐渐地成为党中央议事日程上的重要工作。仅在延安后期，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党的文件，集中阐述了若干重大政策问题。除了重申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提出的土地政策，防止“左”的错误以外，还着重论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7页。

及了关于接管城市和人民政权建设的具体形式问题，进一步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的紧迫工作做理论、政策准备。

1. 接管大中城市。

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座又一座大中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党的工作从长期以广大农村为重心，开始转向以城市工作为重心。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胜利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起点就是接管城市。

从1927年以后，我党我军主要以农村为根据地，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民，日常接触和熟悉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我党我军的很多干部，甚至领导干部都来自农民。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对广大干部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党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烟台、承德、哈尔滨等几十个城市。那时就曾经发生过部队、民兵和后方机关进城乱抓物资、乱搬机器，致使城市工业受到致命破坏的事情，也发生过贫民搬取公用物资，抢劫私人财物以及四郊农民进城抓地主，分浮财，致使城中大批粮、煤和其他公物被抢，一些公共建筑和门窗也被拆卸毁坏。当时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各级领导所重视，也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处理。当发展到战略反攻阶段，大片大片国土即将解放的时候，如何从容有效地接管城市，就成为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了。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总结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经验。石家庄市收复之初，哄抢财物的事情时有发生，石家庄市委及时采取措施，发布公告，甚至实行戒严，枪决极少数罪大恶极者，这一歪风才得以制止。此外，市委还及时纠正了进城伊始，在未查清敌情的情况下匆匆组织工会和贫农团，致使一些国民特

务和逃亡地主混入革命队伍的错误。

类似的偏差，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井陉、阳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都发生过。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将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收复石家庄的经验总结发给各地党委，要求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也撰写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把这一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地区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在这一电报中还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城市里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要求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而不要牵连太广。

第二，没收官僚资本，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产业，是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之首要措施。但是，毛泽东指出，并不是所有国民党人所经营的工商业都属于官僚资本，都应予以没收。必须明确政策界限，只有那些经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由官办的工商业，才算作官僚资本，才应归新建立的民主政府所有，并且由政府派人接管和经营。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对于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要严禁侵犯。

那些确属官僚资本的工商企业，如果民主政府一时还来不及接管，或一时还无力接管，也应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同时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直至政府派人接管为止。如果原管理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

第三，对于那些家在城里，田在乡村的地主，应由民主政府

依法处理，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其中少数罪大恶极者，政府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酌情决定，将其送到乡村听候处理。

第四，管理城市初期，不要忙于组织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而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有妥善解决办法时，才酌量处理；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战争尚未结束，能继续开工，维持原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对于城市贫民，只能有计划地逐步地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对于影响人民生活的粮食和燃料问题，要当作中心问题，有计划地加以处理。

第五，谨慎地选用干部。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来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应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培训，讲清各项城市政策。要使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懂得，城市已经属于人民，要以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城市的精神为出发点，不能还抱着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态度来处理问题，那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及时制定政策，纠正偏差，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各地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执行城市政策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配合部队同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使一座座大中城市比较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2. 关于政权建设。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离开陕甘宁边区之前写的最后一篇党内指示《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

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① 他预计，在1948年，蒋介石的威信将更加破产，我党我军将取得更大胜利，解放更多的地方。大约在1949年，当我们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当我们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的解放区连成片之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便成熟了。为了创造上述条件，党中央决定将当时的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和一个军事领导机构之下。这就包括了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共有5000万人口。这一地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以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机构也将移至华北，与先期到达的以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党中央的下一个落脚点，是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在理论上，毛泽东也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做了准备。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专设一节谈“关于政权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毛泽东在这里已经为新中国起了正式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是由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其领导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权。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9页。

在已经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现在就可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在完成了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农村中，应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而贫农团和农会将成为它的助手。当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县和县以上的政府不仅代表农民，而且代表县、市镇和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的人民，因此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者参加进去。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

总之，像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后 记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我们编著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一书，以表达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深深怀念之情。

参加本书写作的有：高智瑜（第一章）、侯海宏（第二章）、周朝栋（第三章、第四章第二节）、余三乐（第五章、第六章）。人民大学研究生刘超杰编写了第四章第一节，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许孺牛编写了第四章第三节。高智瑜教授作为主编拟定了全书框架，提出了思路，并对全书进行了统改。最后，由吴木教授审定。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限制，本书会有不少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作 者

1993 年 6 月